

國際經濟叢書之四

蘇聯的銀行與貨幣

東北財經委員會調查統計處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949

2.18

·國際經濟知識叢書·

蘇聯的銀行與貨幣

吳敬餘 著



3 0649 5708 1

東北論著出版社印行

1 0 4 0

562.18
137
2

編者前言

這裏共收集了四篇有關蘇聯的銀行與貨幣的論文，都是過去曾在『國際經濟』月刊上發表過的。

銀行和貨幣問題，不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建設工作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裏，仍舊是一個非常有力的武器。因此，對於這些新社會建設的武器與工具，我們一定要具有正確的認識，和懂得怎樣去掌握管理。對此，我們同樣應該向蘇聯學習，學習以馬列主義的觀點，分析和處理這方面的綜雜交錯的理論與實際問題。

這本小冊子，就是在這一目的下出版的。我們希望它會有助於財經工作同志的學習。在譯文方面，如有不當之處尚望各方面予以指正！

『國際經濟叢書』編委會

目 錄

社會主義社會中貨幣的必要及其本質·····	(1)
貨幣流通與國家銀行的任務·····	(21)
蘇聯在1922年到1924年間的幣制改革·····	(48)
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幣制改革·····	(37)
蘇聯儲蓄銀行的任務和使命·····	(110)

社會主義社會中

貨幣的必要及其本質

卡滋羅夫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證實了馬列主義理論的基本原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貨幣是不可缺少的，在轉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程中，貨幣也具有很大的作用。

把貨幣當作工人階級專政的工具而能運用得如此成功，這是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結果。我們說明蘇維埃貨幣在各階段的作用時，曾指出列寧與斯大林的蘇維埃貨幣理論，如何為實踐指明了正確的道路。

一切改良主義者解釋馬恩貨幣理論時，總要抹殺它的革命本質。他們（如希法亭，林納之流）想把貨幣看成與階級關係毫無關聯的、形式的、表面的東西。他們想像中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貨幣，是排除了各種現實矛盾的東西，是調和商品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一種工具。改良主義者曾把貨幣視為一種能使資本主義計劃化成功的手段。

但是，馬恩的貨幣理論，不過是他們關於資本主義運動法則的一般革命理論的一部份。馬恩的經濟學說，說明了商品經濟與貨幣流通的各種矛盾，如何在它本身的發展中產生了資本主義。



貨幣的權力產生資本的權力。馬克思與恩格斯會再三強調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貨幣具有資產階級工具的意義。貨幣不但不消除商品經濟的各種矛盾，反而在新的基礎上造成了擴大這些矛盾的各種條件。但是馬克思與恩格斯當然不會因此就主張：貨幣與資本可以混為一談，要剷除資本主義，就應首先廢除貨幣，正像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

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特別是研究了貨幣的階級作用問題。

列寧在為反對民粹派而寫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書中，明確地指出了貨幣如何成為發展各種資本主義關係的工具。貨幣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把商品生產者分化為富有者與赤貧者。在商品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是經濟自然發展的最重要工具，通過這種工具，價值法則纔起作用。所以，貨幣是站在商品生產者背後計算社會勞動的手段。貨幣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中是一種社會的力量，是資產階級榨取無產者的武器。

列寧的研究不僅限於由單純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時的貨幣作用問題。他還闡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徵，而揭露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貨幣作用。他指出，資本家的獨佔，就是把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切生活部門都壟斷在自己的手中。為了加強對勞苦大眾的剝削，金融寡頭廣泛地利用着貨幣流通的槓桿。為數極少的資本家，藉

助於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托拉斯爲所欲爲，他們利用貨幣貶值，來竭力減低勞苦大眾的實際工資及其生活水平。

列寧的這些理論，由各資本主義國家後來的全部發展史完全證實了。舉凡爲減低工資而普遍地實行貨幣貶值，爲加強榨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而利用貨幣制度等辦法，在資本主義的危機發展期間，都會以向所未有的規模進行過。

列寧與斯大林發展了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並指出貨幣如何成爲資產階級的工具，而加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及其腐朽過程。斯大林同志嘲笑過想藉『聯邦準備制度』來防止經濟恐慌的企圖（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他指出，恐慌會如何同樣地襲擊着信用、貨幣及長期債務等，而瓦解了在各國間及各該國內各社會集團所確立的傳統關係（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他更指出，資本主義社會貨幣流通的『最神聖的東西』——金準備，業已不能無條件地維持資本主義幣制的穩定（一九三三年，黨中央委員會一月全體會議上『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報告）。

如上所述，由於列寧與斯大林對馬克思的貨幣理論給予了革命性的發展，因而赤裸裸地揭穿了作爲資產階級工具的貨幣的作用；並且證實了貨幣並不是資本主義『有計劃的組織』的工具，而是加強它的矛盾的工具。

在一九一九年第一次社會教育會議的報告中，列寧說過，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若干有遠見的社會主義者就主張

貨幣是不能一舉廢除的。實際上在『共產黨宣言』或『共產主義原理』中，也可看到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有利用信用制度必要的馬恩的主張。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的出發點是：預料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時，不可能立刻就廢除貨幣；並且爲了社會主義的利益，無產階級專政也有利用貨幣的必要。

如何纔能夠從使用貨幣過渡到廢除貨幣關係，關於這一點，馬恩並未加以論述。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把社會主義社會描寫成既沒有貨幣，也沒有商業，而是用勞動票或物品券領取社會生產品的社會（例如：『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資本論』第二卷）。

馬恩的這個原理，首先是說明馬克思在研究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時（見『哥達綱領批判』），著重在各取所值原則與各取所需原則的差異問題；至於社會應該如何把消費資料分給自己的勞苦大眾，這件事馬克思並未分析過。恩格斯也是一樣，在他的『反杜林論』中，其著重點並不是過渡到共產主義時的貨幣作用如何，而是在於駁斥杜林那種沒有共產主義生產也可能實行共產主義分配的謬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上述著作中認爲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大眾能夠完全得到他們的勞動生產品而不受絲毫削減，這種見解是與社會主義的現實不相符合的。同樣，他們也沒有提起這個問題：工人階級專政後，將用什麼工具去衡量勞動與消費？在社會主義的各種條件下，衡量社會的勞動量與按勞

付酬的社會工具又是什麼？

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流過程大概不會存在。但對於如何從商品流通過渡到從社會倉庫去直接分配的問題，馬恩並未給以解答。他們用最抽象的理論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祇闡明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各種基本特徵。

用最抽象的理論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有兩個原因：第一，這和他們那種無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在所有主要國家能同時勝利的理論相聯繫着；第二，他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觀，一般雖然根據社會發展的各種規律，特別是根據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知識，但却不是根據當時所未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

『到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階段完了以前為止，貨幣一直是必要的。』斯大林這種先見，乃是社會主義建設全部經驗之理論的總匯，是馬克思貨幣理論的發展。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過，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各人的勞動直接成爲社會勞動的構成部份而存在，所以生產各種生產品的勞動，並不以其物化的本體來表現這些生產品的價值。馬克思這句話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樣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商品經濟下，商品生產者不是個別地、而是平均地取得自己生產品的等值；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下則與此相反，勞動大眾是個別地按勞取酬。

以上幾點極為重要。正像社會主義社會全部經驗所顯示的那樣，這並不意味着價值法則既不存在，直接的勞動計算就有可能；交換形態的商業既經廢除，貨幣也就沒有必要了。馬克思說社會勞動日是個人勞動日的總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到這一點時，馬克思既然致力反駁了拉薩爾『全勞動生產品』的主要原理，那麼，馬克思對於社會主義社會中所殘留着的社會勞動差別問題，自然就認為沒有意義了。他是以抽象的方法來觀察社會主義的勞動的。然而在實際上，既然體力勞動與智力勞動，熟練勞動與非熟練勞動依然存在，階級的差別還沒有完全消滅，所以直接的勞動計算是不可能的。依靠單純的工時測定去衡量參加社會勞動的份量，是辦不到的。因此，用工時去直接計算勞動量也是不可能的。

價值法則雖然不存在，但並不等於就沒有商品。不消說，這裏所說的商品，無論在形式或內容上都是與資本主義下全然不同的商品。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會這樣寫道：『……國家的生產品是與農民交換食糧的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已不是經濟學上的商品，一言以蔽之，它不是單純的商品，它已經成為沒有商品性質的商品了……』（『列寧全集』第二六卷，三七〇頁）。

所以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品，並不是過去經濟學上所說的商品。它是在史無前例的特種商業上，具有蘇維埃商業機

能的特殊商品。這種商品不是按著盲目性法則而生產的。同時它也不是單純的社會勞動生產品。因為它並不被直接分配，而是經由商業系統配銷的緣故。蘇維埃商品，在生產商品所費的社會勞動與商品的具體使用價值之間，並沒有內在的矛盾。在這裏，商品形態祇是表現城鄉間、各邊區各省間以及各經濟部門間有計劃的社會主義交換組織的獨特方式，祇是表現社會主義勞動生產品通過蘇維埃商業機構，將生產品配銷於消費者的獨特組織罷了。

最後，馬克思並未研究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方法以及計算、管制的方法，這是因為在那時還沒有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所以不可能做這樣的研究。

列寧與斯大林研究了無產階級專政怎樣利用貨幣的問題，研究了怎樣使貨幣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工具的問題。

聯共（布）黨綱規定：『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初階段，在生產品的共產主義的生產與分配尚未組織健全期間，不可能廢除貨幣。』（『聯共（布）黨綱』一五頁）

不過，若想廢除貨幣，必須空前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須有龐大的組織及技術上的成就。列寧說過：『若想廢除它（貨幣——著者）就得給數千萬人調整生產品的分配。這是需要長年累月時間纔能完成的事業。』（『列寧全集』第二四卷，三〇一頁）

列寧的蘇維埃貨幣理論，乃是根據過渡期間各種現實的

詳細研究，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總結而發展起來的。遠在一九一八年列寧就已經確定了計算與管制的任務，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他就強調過不能立刻廢除貨幣。

由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及隨之而來的各種經濟政策的問題，使列寧對蘇維埃的貨幣理論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列寧指出貨幣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說：必須利用貨幣這個槓桿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與農民經濟合作化的工具。

他強調為穩定蘇維埃盧布而鬥爭的重大意義。

斯大林同志把列寧的這個指示發展成為有科學基礎而且完整的蘇維埃盧布理論，也就是社會主義的貨幣理論。

研究工人階級專政各種條件下的貨幣作用問題，這和列寧與斯大林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原理，即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國之內勝利的理論有著密切的聯繫。沒有這種理論就不可能理解蘇維埃貨幣的本質。

祇有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領導的決定作用及克服蘇聯的一切內在矛盾，全是藉着與農民聯盟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對資本主義各因素作了階級鬥爭的結果的這種理論，纔能夠說明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工具——貨幣的作用。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席上說：就是在小商品經濟佔優勢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經濟部門也保持着領導作用的我國經濟，是轉向到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的工具，在原則上已基本改變了它的意義，這個工具已經

不利於資本主義而為社會主義服務了。斯大林又說：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也並不能廢除蘇維埃貨幣，而貨幣却正是在完成社會主義建設的鬭爭上所必要的。

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七年在接見外國工人代表席上說明廢除貨幣的必要條件時，曾說：

『我們必須把能計量並滿足全國城鄉需要的轉運和分配機關，都調整到像各人核計自己各種收支預算那樣準確的程度纔行。並且，到我們完成了這一切工作時，也就到了不需要貨幣的時期。不過，達到這種地步，還有一段很遠的路程。』（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九版，三〇八頁）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席上，斯大林同志曾強調：生產品的交換，祇能由合理調整過的蘇維埃商業來代替。貨幣必須促進蘇維埃商業的普遍發展，而吻合於社會主義的利益。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了以前，貨幣一貫是必要的。

生產社會化，就它的本身來說，並不具備過渡到生產品直接交換的一切條件。爲了能夠有組織地過渡到生產品的直接交換，須有蘇維埃商業這門特殊的知識，用以滿足人民隨物資生產水平日益提高而俱增的各種慾望。必須致力學習增加生產，以便把勞動生產品不斷地由生產部門供給消費者，並滿足各種與日俱增的複雜需要。這就是如何能把愈益增多的大量商品供給消費者，與如何能滿足日益增加的各種嗜好及慾望的能力問題。

斯大林同志會說：

『總之，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並不是縮減個人的慾望，而是意味着它的全面擴大與旺盛。更不是限制或否定個人慾望，而是要全盤地充分地滿足文化發達的勞動大眾的一切慾望。』（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八六頁）

爲了能夠過渡到生產品的直接交換，必須提高全部商品流通事業的技術水平與組織水平；並且須有高度的商業組織以及能隨客觀需要而調整的機構。

於是貨幣便成了蘇維埃商業組織及其正常發展的最重要的推動力。

這也就是斯大林同志給貨幣下了以下定義的理由：

『貨幣，是爲了全面地發展蘇維埃商業，以創造生產品直接交換的條件，而由蘇維埃政權所掌握的適合於社會主義利益的資產階級經濟工具。』（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七六頁）

上述的貨幣定義，清清楚楚地指出了貨幣的作用，它一方面是發展蘇維埃商業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成爲消除蘇維埃商業的手段。

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社會最重要的任務。已明載於蘇聯斯大林憲法第十二條。

爲了實現這個原則，必須鼓勵每一勤勞人民特別關切自

己的勞動效果。因而對物化在勞動中的勞動量與取自社會的報酬多寡，必須有嚴格的計算與管制的組織。祇有對於勞動與消費有了最嚴格的計算與管制，纔能保證徹底廢除平均工資制；纔能保證實現按勞取酬的原則；纔能保證培養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而加速提高勞動生產率。向平均工資制作鬥爭，乃是貨幣的計算與管制的最重要任務。

『平均工資制是農民的觀點，是起源於平均分配一切財富的心理，即原始農業「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工資制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毫無共通之點。』（『斯大林與艾米爾·魯道爾夫會談紀要』一九三八年版，一三頁）

共產主義者堅決地向平均工資制作鬥爭的理由是很明顯的。社會的計算與管制，當然不能歸結於貨幣的計算與管制。那是一切管理機關的工作，是全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管制。這種全人民的管制與計算的最重要工具，是用貨幣來作計算與管制，就是以貨幣來表現勞動的結果，並以之作爲購買一定數量生產品的單位。

越是圓滿地調整好蘇維埃的商業，就越能夠徹底地實行按勞取酬的原則。越是圓滿地組織好蘇維埃的商業，也就越能夠刺激大批品質優良的商品的生產；蘇維埃商業越有條理地把商品供給消費者，那麼也就越能提高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

關聯着廢除物品券與愈加廣泛地過渡到蘇維埃商業，黨會認爲貨幣工資正是調整勞動與消費的現實尺度，這是很顯

然的。

各社會主義企業的計算與管制組織具有重大的意義。爲了促進國家企業的計算與管制，並刺激各企業完成生產，商品交易及社會主義的蓄積等計劃，就應該依照經濟核算制來管理各種企業。這種經濟核算制乃是管理國家企業的基本方法。

關於經濟核算制的意義，在列寧與斯大林的言論裏以及黨的許多決定裏，都曾再三地強調過。

在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上，如果沒有貨幣，那就不可能實行計算、管制或經濟核算制。在社會主義階段裏，進行一般經濟上的計算時，並沒有另外的工具，因此就產生了藉盧布來進行管制的這種方法。

當對信用改革問題的歪曲理論作鬭爭時，斯大林曾詳細地研究過這個問題。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是在經濟上結合城鄉的必要工具。在社會主義階段，城鄉在生產上的結合，不但沒有廢除商業的聯繫，反倒把沒有大、小資本人家存在的蘇維埃商業提到更高的階段。蘇維埃盧布越穩定，城鄉間商品的交流也就越加發展。蘇維埃盧布無論在城市或在鄉村，都促進着生產的發展。蘇維埃盧布在將來更須最後地促成城鄉對立的消滅。

因此，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就給蘇維埃盧布下了這樣的定義：盧布是『加強經濟核算制，並鞏固城鄉間經濟聯繫的

最重要槓桿。』（『聯共（布）決議案叢集』第二卷，五八八頁）

我們黨的最重要文件，給蘇維埃盧布下了這樣的定義：盧布是（一）開展蘇維埃商業的工具；及與此任務密切結合的勞動尺度及消費尺度。（二）鞏固經濟核算制的槓桿。（三）加強城鄉間經濟聯繫的槓桿。

這種關於蘇維埃貨幣本質的規定，說明了它所以成爲社會主義工具的特殊階級性質。對於蘇維埃貨幣的這種規定，就是指出貨幣在爲共產主義的鬭爭中，在爲勞動生產率的空前提高與爲共產主義富裕的鬭爭中，以及在爲徹底消滅階級差別的鬭爭中所有的作用。

以上有關蘇維埃貨幣的一切敘述，都說明了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上，蘇維埃貨幣是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直接表現。

貨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一般的等價物，是抽象勞動的物質表現，是社會勞動的矛盾之物化。爲抽象勞動之直接的物化的貨幣，從一切商品之中自然地獨立起來，而成爲君臨於人類及其他各種商品之上的，具有支配機能的特殊商品。

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社會勞動是直接的社會勞動。而且，這種不同的勞動性質，在蘇維埃貨幣中被物化於它特殊的階級本性之中。經濟組織的計劃性與剝削階級的消滅，使社會勞動發展爲直接的社會勞動。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即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社會勞動的根本矛盾，在社會主義各種條件下已不復存在了。斯大林在全蘇第一次斯

楚哈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報告中，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斯大林說：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各人的勞動是自己的事情。高興了你給資本家工作，不高興你就餓死。這和誰都沒有關係。但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勞動是社會的事情。各人的勞動已不單是他自己的私事，乃是對於社會有益的必要勞動。在蘇維埃制度下，勞動者並不是爲剝削者勞動，而是爲自己，爲自己的階級，爲社會而勞動。所以每一勞動人民都自覺自己是自由的市民，是社會的一份子。並且『誰好好地對社會盡其所能，誰就是勞動英雄，誰就光榮。』很顯然的，祇要沒有個人勞動與社會勞動間的矛盾，祇要勞動具有了直接的社會的意義，那麼，蘇維埃貨幣就能够、而且也是勞動的社會性質之直接的表現了。蘇維埃貨幣對於人類決不體現爲超社會的權力。蘇維埃貨幣並不是一種支配人類的特殊商品。它是工人階級專政的工具，它的內容，它的意義是被有計劃地領導全部社會勞動過程的工人階級政權所規定。不論如何巨額的貨幣，都無法購置社會主義的企業，因而蘇維埃貨幣不可能成爲資本。

蘇維埃貨幣不是君臨於一切商品之上的特殊商品，這由蘇維埃貨幣的各種保證的性質，又得到了最好的證明。

對於這個問題斯大林也詳細地研究過。他指出，按穩定的公定價格出售的商品量，就是蘇維埃貨幣的第一個保證。顯然的，這種保證的性質，說明了在我國，貨幣與商品之間是沒有矛盾的；又說明了在我國貨幣與商品之中，體現了勞

動的直接的社會性質。

由於以上的事實，蘇維埃貨幣在生產及商業上有計算與管制的功用，並能夠成為勞動與消費的尺度，而且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苦大眾通過蘇維埃商業，從社會生產品中按勞應得的領取物品手段。

所以，蘇維埃貨幣乃是社會主義的計算與管制的一般工具。因此，在我國貨幣與商品之間雖沒有矛盾，但顯然是有差別的。爲什麼呢？因爲貨幣是計算與管制的工具，它有檢查與刺激商品交易的功用，也有檢查與刺激生產的功用。

但是，如果在社會主義各種條件下，貨幣體現了勞動的直接社會性質，那麼，就要發生這種問題，就是在同樣勞動具備直接社會性質的共產主義最高階段的各種條件下，貨幣爲什麼就不存在了呢？這因爲直接社會勞動在它本身的發展中，顯然有社會主義的與共產主義的兩個不同階段。實際上，勞動在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各種條件下，雖都具備直接的社會性質，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與共產主義制度下，勞動的直接社會性質却有不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界限，雖然漸被消除，但在城鄉勞動組織之間還有差別；同時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界限，雖然也漸被消除，但兩者之間也還殘存着差別。

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即使勞動有直接的社會性質，有直接的社會意義，但用按勞取酬（由此發生了按勞分配）的辦法來刺激勞動的特別組織還是必要的。在共產主義的條件

之下，城鄉勞動間的界限已經完全消除。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也消除淨盡，自然就無需對於勞動再作任何的特別刺激。因為在社會各成員間將會產生各盡所能以貢獻社會的自然慾望。

所以，在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由於社會勞動的特殊性，纔需要社會主義的分配與計算的工具——貨幣。同時，這還意味着無論是爲了完成廢除階級差別的任務，或是爲了完成社會主義再教育的任務，即建立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養成社會財產的主人翁態度等任務，貨幣也是必要的。上述的一切任務，都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及在漸次移向共產主義的過程中必須解決的。

蘇維埃貨幣由於它的階級本質而與資本主義的貨幣根本不同。它在其自身中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利益，成爲對資本主義鬥爭與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工具。

這種富有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新工具的貨幣，其使命已由列寧、斯大林的蘇維埃貨幣理論所闡明。這個理論確切地指出了直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完了爲止，貨幣始終是必要的，並說明了蘇維埃貨幣與資本主義貨幣的本質上的不同。列寧與斯大林對於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貨幣作用的說明，和他們關於蘇維埃貨幣的學說，都是在馬克思主義貨幣理論上最重要的貢獻。

共產黨的一切貨幣政策，即有系統地穩定蘇維埃盧布的鬥爭，及利用貨幣作社會主義工具的政策，都是根據着共產

主義建設工具——貨幣的必要性而實行的。

過去黨會因蘇聯仍殘留着剝削階級，估計到貨幣還有被他們利用的可能，於是便在澈底消滅這種可能的目的下，展開了抑制這種可能的堅決鬥爭。同時，黨也提出了自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來貨幣所表現的新作用與新意義。

從工人階級勝利的第一天起，貨幣便成爲工人階級專政的工具。貨幣被用來根絕資產階級的經濟權力，並限制、排擠資本家份子。它被用作戰勝資本主義的工具。貨幣這種槓桿，在鞏固國防與保障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國民所得重新分配事業上，正起着最重大的作用。

貨幣還被利用於使勞動人民從資產階級的桎梏下永遠解放出來的事業上。

我們說過，蘇維埃政權會利用貨幣這種槓桿，通過預算、信用、租稅等等以援助及優待貧農與中農；並且用它來限制和排擠富農。不消說，在某種程度以內，富農與私商利用過貨幣貪圖私利；但在基本上蘇維埃貨幣却爲無產階級打擊資本家和富農，因而是爲社會主義而服務的。

城市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鄉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及財源的重新分配，都藉貨幣這種槓桿而得到了有計劃的保證。

使蘇維埃盧布愈益穩定的鬥爭，愈益利用盧布來作計劃經濟工具的鬥爭，都是爲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鬥爭。

在消滅剝削階級以前，蘇維埃貨幣在社會主義各部門裏，並不僅僅有計算與管制的功用，它同時也被用作刺激小

農經濟。並且在某種程度內貨幣也能利用了資本主義份子。

在消滅了剝削階級以後，蘇維埃貨幣便充分地發展了它作為社會主義工具及刺激社會主義勞動的特徵。

蘇維埃貨幣這種兩個發展階段上的特徵，也可以說是蘇維埃貨幣流通計劃化的性質及各種保證蘇維埃貨幣穩定方法的特徵。

社會主義之所以有效地利用了貨幣，這是因為列寧與斯大林即使在貨幣問題上，也不為已經過時的原理或結論的字句所束縛，而勇敢地把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加以普遍化；發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創造了社會主義制度下貨幣的必要及其作用的新理論的結果。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席上說過：『如果要求馬克思主義的古典學者們對於可能在五十年或百年後、在每一個別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理論問題，都給予現成的答案，而我們馬克思主義的後裔，就可以安然睡在火炕上圖圖吞棗地來接受這種答案，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斯大林：『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報告』五四頁）

斯大林同志在黨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席上，就國家理論的發展而將社會主義建設經驗加以普遍化了的那篇值得注意的報告中，也曾指給我們貨幣理論上的新方向。斯大林同志說：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上，其經濟、組織機能的發展雖然貧弱；但這種機能在第二階段上却能充分地發展。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組織機能的工具，即蘇

維埃貨幣，已進展到更高的發展階段，成爲社會主義工具的貨幣意義之所以更加重大的原因，也便更爲明顯了。

工人階級的敵人，躲在繁瑣的哲學原理背後，想要破壞蘇維埃貨幣。其中有的人主張：在蘇維埃的經濟裏假若有貨幣存在，那便是資本主義的貨幣，爲什麼呢？因爲他們說別樣的貨幣是不可能有的。還有的人固守着陳腐的教條詞句，企圖證明貨幣與社會主義二者不能並立。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這樣地告訴了我們：

『機會主義者並不常常都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否認這個理論的個別原理和結論。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於企圖拘守着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個別原理，把它們變成教條，這樣來阻礙馬克思主義向前發展，因而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展。』（『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三四一，三四二頁）

主張貨幣在實現社會主義的同時就要消滅的『左』派反黨的『理論』，就是以這種姿態（按指拘守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的個別原理——譯註）出現的。斯大林同志把這種『理論』及其理論家反布爾塞維克的心理毫無保留地揭穿了。

我們在蘇維埃貨幣史的概論中，已經指出有關蘇維埃貨幣作用問題的各種歪曲的反革命理論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破壞蘇維埃貨幣制度，企圖恢復資本主義貨幣制度，並恢復一般資本主義制度。

黨以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武器，對那幫把間諜、暗害者

的真面孔藏在右傾或『左傾』的假面具之下、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的卑鄙份子作了堅決的鬭爭，因而纔擊敗了資本主義，纔能使貨幣很有效地成爲社會主義的工具。

本文爲『蘇維埃貨幣論』第九章第一節的全譯。原題爲：『列寧、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社會貨幣的必要及其本質的理論』。譯文係自日譯重譯。日譯載滿鐵『蘇聯事情』第十一卷第四期。文中的附註及旁點，都是原著者加的。

貨幣流通與

國家銀行的任務

正常的貨幣流通和穩定的蘇維埃盧布，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物質與文化發展的主要條件。黨和政府的領導者，特別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都極端關懷着貨幣流通及盧布穩定的問題。

蘇聯的貨幣流通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貨幣流通，它沒有那種盲目的、自發的運動法則；也沒有生產過剩、失業、經濟恐慌與蕭條、生活水平的下降、物價的波動及投機搗把等問題。蘇維埃盧布和貨幣流通的整個體系，是依靠着突飛猛進的社會主義經濟力量，在有計劃有組織的堅固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我國的貨幣擁有世界上最鞏固的保證準備。因為國家掌握着按照穩定的價格投入商品流通的大量商品，這在經濟上，就給我國的通貨打下了空前鞏固的基礎。

我國的貨幣流通不是自發的，而是按照合理的原則，以配合國家的經濟計劃的。

雖然如此，但根據我國經濟的計劃性，就認為必須讓計劃經濟本身來解決貨幣流通的機能、數量與週轉速度和貨幣

資金的積累及其分配等問題，而放棄對於這些任務的有意識的領導，那將是最嚴重的錯誤。

貨幣流通是幫助國民經濟發展最靈活的機器。潛伏在國家銀行系統中的敵人，故意擾亂了貨幣流通，使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的危害。他們擾亂了各經濟機關間的結算工作，造成一連串的負債與拖欠。同時在準備增加國家銀行各分行庫存的時候，他們也慫恿各分行發出不合理的通知——雖然在實際上這是毫無必要的。

這些敵人企圖在蘇維埃政府和蘇聯勤勞大眾的面前，公然廢棄蘇維埃盧布，並想破壞蘇維埃盧布的穩定性。

蘇維埃貨幣流量，在每一會計年度，都能隨着社會主義經濟原則與社會主義經濟的高漲，而有適當的增加。這種貨幣的合理增加，必須與國家生產發展的一般動態及流動資財的增加密切地結合起來。但是由於工作中尚存在着某種缺點，致使流過程中的貨幣過度膨脹或不能使資金迅速而正常地週轉時，貨幣的增加便不但不能加速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計劃，反而成爲它的阻礙。

因此，爲了使貨幣流通健全起來，就需要以布爾塞維克的精神作嚴肅的鬭爭。就要憑藉靈活地運用政策，以建立起最合理的貨幣流通。要依靠反映蘇維埃人民勞動總和的信貸計劃及收支計劃的嚴格執行，依靠對盧布的嚴格管制，更依靠社會主義經濟核算制的鬭爭，來完成黨及政府所課予的一切任務。

蘇維埃貨幣已在全體國民福利的日益增長中穩定與壯大起來。勤勞大眾的生活水平，隨着社會主義經濟的繁榮而高漲。社會主義激起了蘇聯國民嶄新的、空前的大量需求，同時也滿足了他們的需求。因此，蘇聯的貨幣制度就更加鞏固了。

我國『國民收入的分配，不是爲了使剝削階級致富，不是爲了使那些寄生蟲致富；而是爲了有系統地提高工農的物質條件，爲了擴大城鄉的社會主義生產』。（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三九七頁）

黨所決定的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和勞動與分配的社會主義組織，在短時期內已創造了龐大的財富。在十年前的一九二八年，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零售商品交易額是一百四十億盧布，但在一九三八年，由於商品零售店舖的普遍增加，零售商品交易額將達一千四百億盧布。

社會主義的商品流通，是提高我國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水平的主要條件，也是鞏固蘇維埃貨幣的基礎。

幾十萬蘇維埃銀行工作人員的最主要任務，就是爲建立正常的商品流通而鬥爭，爲維護商業上鐵的紀律而鬥爭。

在我國，勞動是按照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而獲取報酬的，所以違犯了工資基金支付的財政紀律，就是直接危害蘇維埃公民的利益。危害這種利益，就是混亂精密結合的計劃目標，破壞其相互間的聯繫。某些企業工資基金支付的超過，就是經濟活動不良的結果，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放縱，就

是處理國民資金工作上的反國家行爲。

以布爾塞維克精神組織的貨幣流通，需要在銀行工作的一切部門中，徹底地遵守財政、收支與信貸等業務上最嚴格的紀律。

幾十萬銀行工作人員要正確地執行信貸計劃，要加強信貸與結算的紀律性，要爲動員浮餘資財與貨幣資源而進行堅決的鬭爭，要廣泛地吸收日益增加的人民蓄積，要使經濟機關與衆體農莊變成爲人民服務的模範，同時更要建立起正常的貨幣流通與貨幣支付網。

蘇維埃盧布的穩定性

在蘇聯，社會主義的經濟機構是經濟的絕對統治力量，唯一的領導力量。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貨幣，它的本質已經有了根本的改變。蘇維埃貨幣已由剝削、積累與投機的手段變成了爲社會主義而鬭爭的有力武器，變成了實現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工具。蘇維埃貨幣正發揮着最重要的經濟機能，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神聖工具。只有通過蘇維埃盧布，纔能核算社會主義生產品的成本。黨和政府爲了加速社會主義的建設，爲了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鞏固國防以及增大國民大眾的福利，利用了作爲社會勞動計算手段的貨幣，依照計劃價格以分配社會生產品，並實行了價格政策。

作爲社會勞動計算工具的貨幣，就是保證管制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經濟核算的基礎。

蘇維埃貨幣是發展蘇維埃商業所必需的流通手段。蘇維埃貨幣一方面發揮流通手段的機能，一方面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因此，國家銀行便藉信貸的方式，通過盧布，對生產計劃、財政計劃及商業計劃的執行加以經濟上的管制。蘇維埃政府一方面利用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機能，一方面又通過國家銀行以信貸作媒介，配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來重新分配國內的蓄積。

最後，工農聯盟的國家，利用貨幣的儲蓄機能，通過公債與儲蓄來吸收勞動人民的游資，並按照計劃的程序，把這種蓄積撥充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資金。

托洛茨基、布哈林匪幫的奸細、暗害者，看到貨幣在蘇維埃經濟中所具有的重大意義，便否定了蘇維埃貨幣與資本主義貨幣原則上的差別；同時還宣傳着貨幣『消滅論』，來削弱蘇維埃貨幣。他們對於蘇聯貨幣的本質與使命作了種種的曲解，他們到處武斷地主張以單純的工時核算來代替蘇聯的貨幣。這與下述列寧的指示是背道而馳的。列寧說：『……不能馬上消滅貨幣，若想消滅貨幣，就必須為幾千萬人民調整好生產品的分配機構，這是需要長年累月纔能完成的事業。』（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三〇一頁）敵人還用這種消滅貨幣的反革命的煽動言論，來和斯大林的『貨幣在我國還要保持一個長時間，直到完成共產主義的最初階段——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為止』的理論對抗，主張用所謂『消費券』和『計算票』來代替貨幣。

敵人藉助於這種理論，想抹殺已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工具，並已為社會生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的經濟管制工具——蘇維埃貨幣的功用。

同時，他們在這樣反革命的、牽強附會的『理論』上，建立了信貸部門自流主義的有害基礎。

布爾塞維克一向是機警地、不屈不撓地保衛着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主義的貨幣理論，黨對於蘇維埃盧布的穩定性與其高度的購買力，曾賦予以重大的意義，並為加強它而進行着有系統的鬭爭。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報告中，曾這樣自問自答：『依靠什麼東西來保證蘇維埃貨幣的穩定呢？』『……當然不僅是黃金準備，保證蘇維埃貨幣穩定的，首先就是國家所掌握的大量商品，這種商品是按照穩定的價格轉入商品流通的。有那一個經濟學者能夠否認祇有蘇聯所獨有的這種保證，纔比任何的黃金準備更能切實地保證通貨的穩定性呢？』（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第十版、五〇六頁）

擁有大量黃金準備的國家例如美國等，也不得不捨棄舊的金本位制，來設法保證自己通貨的穩定。

這種事實，並不是說黃金、貴金屬及穩定的外幣，都失掉了作為蘇維埃貨幣保證準備的一切意義。黨及政府總在竭力增加黃金準備，從未放棄過蘇維埃貨幣的這種保證準備。

黨和斯大林同志為了加強蘇維埃盧布，擴大商品流通，

降低物價，增加國家歲入的項目，嚴格調整國家的支出及加強財政紀律，曾以全力進行不斷地鬭爭，以擴大國民的收入。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就是造成將來新收入來源的基礎，同時也是滿足人民消費需要的基礎。

國家預算年復一年地獲得了盈餘，這清楚地反映了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蘇維埃財政措施的成功。

我們不僅不知道什麼是經濟恐慌，什麼是那經常搖撼着資本主義國家財政的預算赤字；反而在第二次五年計劃期間，獲得了約值一百一十億盧布的盈餘。

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帝俄資本主義所承繼下來的遺產，就是那種幣值急劇下跌的盧布。在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以前，貨幣流通量大約是二百億盧布，一九一三年的國民收入是二百一十億盧布。如按一九二六——二七年的幣值計算，一九三八年的國民收入將達一千一百二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大工業的生產品，較一九一三年超過了八倍以上。

配合着國民收入的增加，蘇維埃商品的流通量也增大了。一九三二年的商品貿易額為四百零三億盧布，在一九三七年就增到一千二百五十億盧布；根據計劃，一九三八年將達一千四百零五億盧布。

這樣，一九三八年的國民收入將超過戰前（一九一三年）五倍以上，蘇聯的預算，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增大了十三倍。商品零售貿易額，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二十五倍，但貨幣流通量在此期間却大大地減少了。

蘇維埃國民公債的成功和儲蓄存款的增加，也是加強蘇維埃盧布的主要原因（公債和存款的數目，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的九億七千七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七億盧布）。

這一切都是我們全部財政系統和盧布強化的堅固支柱。

經濟部門需要大量的貨幣，祇在兩次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投資即達兩千億盧布。同時，在此期間流動資金也隨着大量地增加了，國家銀行的信貸資金和收支，也有巨量的增加。

蘇維埃國民經濟的大量固定資金，藉經濟機關的流動資金，而獲得了靈活的運用，這種資金的總額，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是四百五十七億盧布。

雖有這樣龐大的金額，但對於國民經濟各部門在兩次五年計劃期間所創造的流動資財來說，還是不夠充分的；於是蘇維埃短期信貸的意義，也就更加重大。從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到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這種信貸額由一百零四億盧布增加到四百零二億盧布。

國家銀行的信貸流通額和收支流通額，便是按照這種級數而增大的。

國家銀行對各經濟機關一年間的信貸額，一九三三年是一千零十億盧布，一九三六年便增到二千八百四十億盧布。至於國家銀行與專業銀行間的收支流通額，一九三三年是四百九十億盧布，一九三七年便增到一千二百四十億盧布。

爲了使大批商品不停地流轉；使大量的信貸流通和貨幣

流通爲發展經濟而服務；使蘇維埃盧布經常靈活地週轉；更爲了使盧布的信用愈益加強及以最小限度的貨幣量來滿足商品、貨幣與信貸流通的需要；這不僅要有增大和促進商品與貨幣週轉的一般經濟條件，還必須提高銀行的工作效率。

蘇維埃貨幣流通機構的特徵，就是貨幣要通過有計劃的信貸系統纔能轉入流通過程，所以貨幣的流通量隨着商品流通的需要而增減。生產的季節性擴大，雖然促成了貨幣量的增加；但由於國家建設和商品流通量的季節性收縮，就必須通過信貸系統從流通中把一部分游資收回。

蘇維埃國家通過信貸計劃領導了這一工作。

不知經濟恐慌爲何物的蘇維埃經濟，由於整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的特殊性，消滅了通貨膨脹的可能。

我國的盧布雖然是很鞏固的並擁有最可靠的保證準備；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對於貨幣流通的問題，就可以沉醉於勝利的成功而放任自流。

在我國，還有進一步加強盧布及健全貨幣流通的必要。爲了執行黨和政府關於這方面所頒發的指令，就需要不屈不撓地進行鬭爭，祇要澈底、適當的進行這一鬭爭，在國民經濟上就能獲致鉅大的效果。所以國家銀行必須不間斷地重視貨幣流通的基本過程，即最主要的收支動態。

國民的貨幣收入與制約貨幣回籠的商品基金間的正常關係，就是穩定盧布和組織正常貨幣流通的最主要條件。

國家銀行一方面運用信用制度，以盧布管制企業的經濟

活動；一方面幫助日用必需品的生產，並改善對於國民文化生活的服務。

同樣，爲了工資基金的正當支出，國家銀行對於這種支付行爲也應加以管制。因爲在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工資是國民收入的基本源泉。

正確地樹立信貸計劃，祇對真正需款的企業給與信貸，嚴格執行信貸計劃的限制條件，消除負責與拖欠，加強經濟核算制與財政紀律及爲動員浮餘資材而進行鬭爭等，都直接表現在完成國民經濟計劃的工作上，表現在貨幣的發行數量上。

改善國家銀行的信貸業務，是爲加強蘇維埃盧布而鬭爭的最主要前提。

計算與管制人民以租稅、保險費及其他形式所繳納的貨幣的工作，也是國家銀行的主要任務之一。

國民的貨幣收支，在原則上必須使收入能超過支出，以加速資金的積累。

國家銀行必須監督游資的回籠，同時對於推銷公債，吸收游資也應大力予以幫助。

下面的情況更須特別指出：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機構中，在合作社的機構中以及在羣衆間的貨幣流通範圍內，各人民經濟組織間的貨幣流通佔着很大的比重。在這種流通過程中，集體農莊市場的貨幣流通最佔優勢，至於尚未合作化的家庭手工業的貨幣收入，則寥寥無幾。

國家銀行在訂定收支計劃時，須斟酌貨幣的流通量，以幫助集體農莊商業的發展；並應通過信貸政策，幫助家庭手工業產品的銷售，促進農產品生產的增加，以組織工業品與農產品的交流。

最後，國家銀行必須着手收回流通在集體農莊市場和家庭手工業產品銷售過程中的貨幣。更須特別重視促進資金週轉與組織貨幣流通的純粹的銀行措施。

因此，就應當盡力改善收支計劃，迅速澈底消除暗害行爲在這種工作領域內所招致的惡果。

對於組織貨幣流通和穩定盧布具有最重要意義的，就是改善收支業務，活用現款（一部份收支業務的規律化）和文件的合理處置等工作。

信 貸 計 劃

國家銀行藉信貸計劃來執行黨及政府向各經濟部門重新分配貨幣基金的命令，這是根據貨幣需要的緩急與收回的可能性並嚴密地配合着國民經濟計劃而執行的。

人民的公敵，用盡了一切辦法來扶植商業的信貸化。他們企圖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破壞信貸與經濟、信貸與預算以及信貸計劃與財政計劃間的聯繫。尤其是他們頑強地想把國家銀行與財務人民委員部對立起來。

計劃期間所需貨幣流通量的多寡，是由國家銀行的信貸計劃及與之有機結合的收支計劃來規定的。

正確地規定信貸數量——首先規定每一經濟部門季節性的資財蓄積與運輸方面所需的信貸數量——對於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和組織貨幣流通，具有決定的意義。

當訂定信貸計劃時，如不考慮各企業的資財儲存狀態，就不能徹底完成這種計劃的任務。銀行決定信貸時，必須熟悉借款機關的一般狀態及其業務情況，同時還須考慮借款機關資金的週轉、調動與節約等條件。因此，信貸計劃總能發揮藉虛布管制與加強經濟核算的機能。

對於超過計劃的資財儲藏，也須進行鬭爭，因為不必要的資財儲藏，時常成為工業企業財政困難、拖欠與負債的根本原因。

整個國民經濟中超過計劃的資財儲藏，約達數十億盧布。僅僅根據三十六個國家銀行分行所調查的材料，在今年（按指一九三八年，下同）第一季，工業部門的浮餘資財即達四億盧布之多。此外經常負債與拖欠的企業，也在儲藏的方式下，長期地死藏着大量的資財。

試舉一個典型的實例來看，這就是德聶伯爾彼得羅夫斯克市的李卜克內希鋼管工廠。該廠長期地違反了財政計劃的紀律，對於材料供給機關從未如期付款。據國家銀行的調查，業已明瞭該廠財政困難的根本原因顯然是在於超過計劃的資財儲藏，除了三百零四萬九千盧布的半成品外，還擱置着三十八萬七千盧布的備品和十九萬三千盧布的其他材料。

儲藏這些資財的原因，經過仔細的分析業已判明：主緊

是由於工廠行政方面各部、科相互間，一部份是由於計劃、供給及財政各部相互間關係的不正常。該廠倉庫的剩餘材料中，有鉛丹三百七十六公斤。原來在今年年初已有鉛丹十七公斤，二月又買進了三百六十公斤，但在四個月中所消費的總數量不過一公斤而已。由此就可以瞭解該工廠資財的富餘程度。

管理總局對於工廠商品基金分配制度的執行，也完全不能令人滿意，以致積累了大量的浮餘資財。例如鋼管工業管理總局撥給李卜克內希工廠鐵礬土三百噸，錳礦石六千噸，鐵礦石三千噸，但該廠因此項原料備存很多拒絕收貨；不過最後還是把鐵礬土和錳礦石收了下來。

如同鋼管工業管理總局所屬的李卜克內希工廠所發生的現象，並不祇一處。在其他許多企業以及黑色金屬冶煉企業部門也多少有同樣的現象。例如『電力製鋼』工廠（諾金斯克市），存有一千四百萬盧布超過計劃的資財；『鑄刀鐵錘』工廠（莫斯科），存有四百萬盧布以上超過計劃的資財；鋼管工業管理總局所屬的庫依貝舍夫、安得列耶夫等工廠都存有二級品鋼管達一千萬盧布以上。管理總局對這些鋼管的推銷，都未採取過十分有效的措施，所以這些工廠都極感財政困難，以致對於材料供給部門未能及時付款。

據概略的估計，僅重工業部門各企業如果把今年第三季所儲藏的浮餘資財清理一下，就能動員一億至一億五千萬盧布以上的資財；就整個國民經濟來說，在同一季中就可能動

員十億盧布以上。

銀行的工作不應局限於揭發浮餘資財或向該經濟機關提出建議令其出售的範圍以內，而幫助銷售這些浮餘資財，經常檢討這一工作的進展情形，努力推進這一工作並關切其最終的結果，也是國家銀行分行和辦事處的職責。只有根據最終的結果，纔能判斷每一分行和辦事處動員死藏資財的工作如何。

對於推銷儲藏資財工作具有重大作用的，就是所謂調劑機關，它的任務是調劑和推銷企業方面的浮餘資財。這種業務是由重工業人民委員部供應管理總局的分支機構、機械供銷合作社和機械修理托拉斯管理總局來執行的。但引以為憾的，這些管理總局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也未能滿足經濟機關的需要。許多供應管理總局的分支機構拒絕從企業收購不便銷售或有時間性的浮餘資財。他們只樂於接受或收購易於利用且能早日清賬的資財。同時由分支機構所接受、收購的資財，也銷售得特別遲緩。

對於調劑機關的信貸制度，也有重新加以檢討的必要。應該根據調劑機關是否完成銷售計劃，來決定對他們增加或停止信貸的條件。爲了加速完成收購與推銷計劃，國家銀行對於正在完成或超過計劃的機關，應建立特別優待的信貸制度。

在工業企業方面還有大量的資財隱藏在半成品的滯貨中。經過分析業已瞭解：在這些滯貨中摻混着許多在技術或

種目上不相符合的，不適合於加工利用的東西。這種半成品的積累是由於零件、附件生產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半成品是散存在各處的，例如在鑛業機械管理總局的特列茨基工廠，超計劃的半成品滯貨達三百萬盧布；在庫茲涅茨克冶煉工廠，有一千四百萬盧布；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聯合工廠，有三百萬盧布。其實半成品的大部份，都能無條件地變成週轉靈活的流動資金。

銀行藉盧布所實行的管制，不應只以借款機關的業務範圍為限，國家銀行應依據工業、農業各部門情況的分析，根據國民經濟各部門和整個國民經濟的分析，大力幫助各種企業經濟，財政工作的改善；同時通過這種辦法，對於資金的正常蓄積，流動資金的重新分配，重要經濟技術經驗的普及，相向運輸的消除等也應有所援助。

因此，把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列於信貸計劃的編制以內，是有巨大意義的。

若藉盧布實行真正的管制，銀行工作人員就必須瞭解企業的經濟、財政狀況，如果對生產不加以具體的研究，這種目的就不會達到。

銀行必須有系統地調查經濟機關的財政狀況，經常考察信貸的償還情形，重新衡量信貸的保證，並分析經濟機關的收支是否平衡。

違犯信貸與支付的紀律，就是破壞信貸計劃的重施，阻撓盧布的管制，顛覆經濟核算制的基礎，直接打亂銀行的信

貸體系。

國家銀行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對負債與拖欠作鬥爭，一九三八年的頭幾個月，負債與拖欠的數目雖然比以往已減少了十億盧布左右，但現仍然存在著龐大的數目。截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對商業機關購買材料的負債額是八億六千八百萬盧布，對銀行的拖欠額是二億八千三百萬盧布。

動員國內資源，徹底實行通貨緊縮政策，努力完成生產計劃，為工資基金的正當支付而實行管制等等，對於消滅負債與拖欠都有決定的作用。加強經濟機關的支付紀律，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國家銀行對於狡猾的負債機關，應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國家銀行不僅是蘇聯信貸的中心，而且是各經濟機關結算的中心。信貸與結算是為防止負債與拖欠而賦與國家銀行的有力武器，同時它也是與下述的政策相並行的。這種政策就是廣泛採用轉賬的結算方式和由於生產與分配的社會主義計劃性所產生的一切完備的結算方式。這種結算方式有相互結算、計劃結算和抵銷結算三種。

蘇維埃商業的不斷擴展和整個商業組織的完成商品流通計劃，對於組織貨幣流通和穩定蘇維埃盧布，都有決定的意義。

家庭手工業合作社，地方工業及重工業企業日用必需品生產的擴大，特別增大了商品流通中新商品的數量。

蘇聯商業人民委員部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所頒佈的

關於製造鐵器、傢具等日用必需品的決定，已提出了爲大量製造日用必需品和提高其品質而鬭爭的綱領。

國家銀行工作人員必須爲促進日用必需品的生產而鬭爭。但大多數分行和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還未注意到這一點。信貸機構還未充分地被運用於日用必需品的增產上。例如在莫斯科四百個家庭手工業合作社中，祇有少數的合作社運用信貸來擴大生產。

人民公敵盡力想窒息並紊亂蘇維埃的商業，以致使幾千萬盧布的商品在積壓、死藏着，因而造成了某處經年儲存着『蓄積』，同時別處則特別缺少這種商品的現象。這樣在商業上便形成了超計劃的人爲的大量積壓，以致商業機關實現的回籠逐形減低，而危害了正常的貨幣流通。

銀行工作人員必須徹底肅清暗害行爲在商業部門所遺留的惡果。編製蘇維埃商業信貸計劃，必須按照各地區的重要性和人民的需要情況，而以各地區的經濟目標作爲基礎。對於距離腹地、中心地較遠的省份、城市、重要工業地區及新建設地區，應盡力設法供應足夠的信貸。

商業部門沒有充分地完成任務，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的商品流通計劃也沒有完成，對此，國家銀行是應負一部份責任的，因爲國家銀行掌握着商業信貸的樞紐。

從下述數字裏，就可以知道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國家銀行爲商品流通所貸出的資金增到了什麼程度。即一九三三年對商業部門的貸款額是三百四十九億九千三百萬盧布；一

一九三四年是四百七十八億二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三五年是六百五十七億四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三六年是九百零七億三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三七年是一千七百三十億六千一百萬盧布（一九三七年貸款額比一九三六年增加的原因，不僅是由於商品流通量的增加，同時也是由於結賬上的特殊情形而將一部份款額轉到信貸項下的關係）。

國家銀行藉信貸和運用盧布的管制來幫助蘇維埃商業完成黨及政府所付託的一切任務。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必須監督每一商業機關如何執行計劃和完成蓄積的任務。同時還須盡力防止商品停滯，盡力將社會主義的工業品，迅速地供給消費者。

商業機關有鉅額的債權與債務，也是值得注意的。這種債權與債務，既與我國經濟的計劃性不相符合，又使銀行的事務益趨複雜。

減少負債額是使商業機關的財政狀態日趨好轉和加速貨幣流通的最好方法。關於負債額，在第二季中，商業人民委員部所屬的各商業機關應減少二億盧布；消費合作社應減少三億盧布。

國家銀行的頭一個目的，就是查明商業機關的財政狀況及其平衡狀態。在商業機關的實際業務中，必須把轉賬結算、計劃結算及抵銷結算等制度的基礎打好。國家銀行應堅決要求經濟機關結清債務，否則即控告於地方的黨機關或蘇維埃機關，以便將案件移交法院或調停機關來處理。同時國

家銀行也有義務縮小債權的限度。銀行工作人員對於經濟機關的結賬應比過去更加注意，要在結賬時使經濟機關得到充裕的資金。

努力減少各商業機關所堆壓的大量滯貨，也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季中滯貨的處理，消費合作社應減少二億五千萬盧布；商業人員委員會所屬的商業機關應減少一億盧布。但商業人民委員會所屬各單位在第二季的頭兩個月，不但沒有減少滯貨，反而增多了六千萬盧布的商品。

此外，與此同樣重要的任務，就是管制商品，使其適時地流轉到下級的零售網。例如七月二十一日在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市場上，沒有鮮魚上市，但同時在鄉村却存積着八百噸魚。這就說明商業機關商運輸業未能保證向城市供給足够的鮮魚。還有許多商業機關，未把運到城市來的商品出售。

對於配售商品、組織行商、開設商亭及組織定期或臨時市場等工作，國家銀行應利用信貸這一辦法大力幫助，以使商業機關更能接近消費者。有些商業機關也沒有履行在結賬點貨期間不許停止營業的指令。伊斯特林斯基邊區和莫斯科省的大商店，為消除滯貨曾停止營業兩三天；莫奇西琴斯基的工業品批發部，也因此從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停止了交易；向商業網供給麵粉與砂糖的茲沃尼古羅得斯基的食品批發部，從五月八日到二十六日一直都是在關閉着。

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應積極設法縮小超過計劃水

準而不用現款交易的商業，同時還應澈底監督零售商業的交易性質及其動態。

收 支 計 劃

國家銀行的收支計劃，是為執行貨幣發行業務和保證國民經濟所需貨幣量而鬭爭的有力武器。國家銀行借助於收支計劃來調節和組織各省、各區、各共和國以及全國的貨幣流通。與信貸計劃相並行的這種收支計劃，是根據國民經濟計劃的任務而編製的，它是完成國民經濟任務的管制工具，也是積極利用信貸機構以順利完成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工具。

國家銀行系統中的敵人，一面盡力想窒息和妨害貨幣流通，搖撼盧布的穩定性，同時還使貨幣收支放任自流，因而破壞了分行和辦事處收支計劃的執行。

動員貨幣資源到最大限度，加強收支紀律，為工資基金的正當支付實行嚴格的統制，揭發並利用在經濟部門所隱藏的物質資源與財政資源，——這都是為完成收支計劃而應展開鬭爭的基本方向。

國家銀行系統還未規定出實施收支計劃的妥善辦法。收支計劃雖然也時常涉及資金動態的統計資料，但這些資料都是與有關邊區、省份國民經濟的發展計劃脫節的，都是未參酌具體的經濟狀況而作成的。

例如：基洛夫省的分行和辦事處便偏重形式，對處理貨幣流通問題毫不負責。沙保林斯基分行，在第二季預算的

『其他收入』項下祇預計了六萬盧布，但實際收入則是二十九萬七千盧布。這種事實說明了：許多分行的領導方面，對於編製收支計劃注意不夠，並且把這種責任重大的業務委任給第二流的工作人員。

在許多省份是由於銀行的錯誤而拖延了工資的支付，實際上，不論有任何理由，這種現象都是不應容許的。這就是某些分行在業務上的官僚主義作風的結果，也就是未能徹底消除暗害行為影響的結果。

國家銀行必須積極加速貨幣流通，以便能及時支付工資，能充分滿足採購與商品流通的需要。如想完成這種任務，就需要在業務上對國民的貨幣收入有銳敏的觀察力，並根據各地區的需要及時放出國家機關和合作機構手中的貨幣，而有計劃地、合理地組織全國的貨幣分佈。另一方面，國家銀行的發行管理局也未很好地領導地方分行，該局的工作人員祇是偶而到分行和辦事處，對於實行促進貨幣流通的各種措施，並未予以具體的幫助。

在商品交易上，建立起正規的現金交易制度和使貨幣流通及時回籠，都是促進貨幣流通的主要條件。但在另一方面，根據商業人民委員部及消費合作社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的資料，在商業機構中就停滯着三億六千萬以上的盧布（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這樣大量的資金停滯，脫離流過程，實在是不應容許的。這種責任，應由那些拖延向銀行繳納實現，違反收支紀律的商業機關擔負。但基本錯誤，還在於沒

有完全作到現金交易。關於這種情形最壞的是鄉村的商業機關，因為鄉村的商業機關依靠中心地區的農場連絡員，把實現繳納於最近的分行。

對於這種業務，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國家銀行總行的發行管理局都應特別注意，並應想出一些促進國家銀行吸收貨幣的組織方法。同時農場連絡員也應積極組織二處收款，如有必要時組織三處收款以及夜間出納，或在集體農莊市場組織出納機構，以便能掌握大量的貨幣流通。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必須發揮創造性，研究加速資金回籠的辦法，以保證完成收支計劃的收入任務。

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應監督商業機關動用商品實現時不許超過一定的限度，同時還要慎重地加以管制，使其隨時將實現存入銀行。

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要展開及時收回商品實現的鬭爭；同時，對收支計劃中其他資金的收入也不應有片刻的鬆懈。

大多數的分行和辦事處，對於這種資金的回籠，都未予以管制。所以這些商業機關還有足夠完成並超過收支計劃任務的後備財源。分行和辦事處的領導方面，對於收入財源的自動回籠和通訊機關與儲蓄會的資金回籠，必須加以實際上的管制；同時也應事先算出可能動員的國民資金與勞動合作資金以及其他應繳款項的現金數量。房租和公共設施費的拖欠，特別阻礙了貨幣資金的動員。關於這種拖欠，有些經濟

機關竟達幾十萬盧布之多。每個企業都經過了二、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沒有徵收這種欠款。

國家銀行對於儲蓄業務的漠不關心，也是不應容許的。人民公敵在這一部門會作過很多暗害勾當。國家銀行不應當與這種業務脫節，應當很好地幫助儲蓄會吸收國民資金。同時，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還應當在若干別墅或療養地點開辦儲蓄業務。

銀行的工作人員，對於文化建築稅、所得稅、保險費及土地使用費等收入，應特別關心，並應將其拖欠情況報告於財政機關及地方蘇維埃機關。

集體農莊貨幣資金的回籠，在組織正常的貨幣流通工作上具有重大的意義。

去年，集體農莊的貨幣收入超過了一百四十億盧布，有二十萬以上的集體農民在國家銀行設立了活期存款的戶頭，因此集體農莊資金的回籠，便超過了一百一十億盧布。

僅就這個數字，就可以瞭解這一銀行工作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就可以瞭解銀行工作人員在集體農莊的清賬、收支上，在吸收集體農莊貨幣資源為國家銀行活期存款上，所受的國家付託是如何重大。

在第三季，廣泛地展開穀物採購工作時，國家銀行的分行和辦事處，應該特別細緻地隨時結清集體農莊與採購機關間的穀物賬目。這就是能否隨時收回集體農莊貨幣資金的關鍵。集體農莊賬目的結清遲延一天；就等於在活期存款額

上少收了這一天的穀物價款。

在第三季，集體農莊必須向國家銀行償還一億八千七百萬盧布的貸款。莫斯科、梁贊、沙拉托夫斯克及車里亞賓斯克分行，對於貨幣的回籠，都未加緊管理，所以形成了巨額的虧賬。國家銀行的分行，必須盡力幫助集體農莊償還銀行貸款。

工資基金的管制

斯大林五年計劃期間，整個國民經濟的工資基金增加了十倍，在一九三八年工資基金的數額，就增到九百四十億盧布的鉅額。

關於工資基金——佔國民貨幣收入的絕大部份——的正確支出，具有怎樣重大的經濟、政治意義，在這裏已毋庸證明。

經常潛伏在國家銀行系統中的卑鄙的人民公敵——法西斯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走狗們，曾隱蔽並鼓動了工資基金的超額支付。他們企圖削弱蘇維埃盧布的購買力，使貨幣量與商品量不能保持平衡。

對於今年第一季工資基金的利用是否正當，國家銀行的各分行在數月以前，就已進行了調查。調查的結果，工業部門中有許多企業，幾乎都未遵守工資計劃的一切規定。

國家銀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省分行，調查了一百零五個企業，發現其中有九十八個超出了預算，絕對透支額達二百

八十五萬八千七百盧布，而相對透支額則達七百五十九億零四千四百盧布之多。

莫斯科市分行所調查的一百六十五個企業中，超出預算的有一百五十個，絕對透支額是六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盧布，相對透支額是八百三十六萬一千四百盧布。

根據一月份和二月份的資料，在這兩個月期間，輕工業方面的相對透支額，有二千七百二十萬盧布，其中莫斯科省的紡織業是八百一十萬盧布，伊萬諾夫省是七百一十萬盧布。

林業方面的工資支付，也有混亂的現象，在第一季中，雖僅僅完成了計劃的百分之七三·三，但却支出了百分之八三·二的工資基金，相對透支額是七千零二十萬盧布。

這裏必須指出的，就是林業人民委員部和管理總局都未努力消滅工資基金的透支現象。林業人民委員部從未分析過透支的原因。有一些管理局連對工資定期報告的制度也極不注意。例如西伯利亞林業管理局從它所屬的七個托拉斯中的任何一個，也未收到關於第一季工資基金支付的報告資料。

工資基金的透支現象，雖然足以標誌勞動組織的不正常，工資等級的運用失當，未到期的非法支付以及加班的浪費等業務上的許多缺點；但冗員太多，也是產生透支的一種重要原因。幾乎在銀行所查明的一切透支工資基金的企業中，都有人員過多的現象。

工資基金是不能用於其他用途的。違反這種財政紀律的

非法行為很多。例如：『庫拉斯奴伊、配拉古布』聯合企業（亞羅斯拉夫）竟把從銀行領到的工資基金，充作其他費用而支出了二十二萬五千盧布，奧爾涅茨基林業管理局也同樣支付了三十萬一千盧布。

商業機關在本年第一季，也同樣有過透支工資基金的現象，商業方面的相對透支額是二千一百萬盧布。蘇聯商業人民委員部的任何工作人員，對工資的支出也未實行過真正的管理，同時也未分析過所收到的報告資料，所以一直到今天仍然沒有一九三七年度工資基金支出的完整統計資料，對於違反支付紀律的單位，也未加以任何處置。

在工資的支付方面，大半是由於一些企業的領導人未能直接掌握工資問題，因而增加了透支的非法行為。一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企業領導人竟把財政的經營視為次要的業務；對於財政的經營，還殘留着輕視的態度和官僚作風。他們認為財政部的會計師和會計人員，纔應當關心財政經濟問題。

銀行的工作人員，必須努力在業務上擬定各種辦法，以便切實地反映經營情況，瞭解工資基金透支的原因，並設法消滅它；必須向黨及蘇維埃機關報告工資透支的情形，以便藉他們的幫助來迅速解決問題。

國家正常貨幣流通的守衛者——銀行工作人員，必須注意企業財政上最重要的工資問題，要隨時機敏地瞭解問題，並針對每一透支情形分別予以適當的處理。國家銀行在其整個系統中，應重新建立業務制度，以便防止工資基金的非法

支出、國民資金的浪費以及其他違反國家財政紀律的可能性。

目前國家銀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日益加強將來的貨幣流通。這種任務只有依靠一切銀行業務的普遍提高纔能完成。這就需要大力改善信貸計劃、收支計劃以及整個銀行系統業務的質量。

祇有這樣，國家銀行纔可能很好地完成黨及政府所給予的重大任務——使貨幣流通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計算整個的國民經濟及藉盧布來嚴密地管制社會主義經濟。

附註：這篇論文是蘇聯國家銀行工作人員的集體創作，發表於一九三八年『貨幣與信用』月刊第三——四期。譯文是根據一九三八年『蘇聯事情』月刊（滿鐵調查部）第九卷第四期的日譯重譯的。個別地方並略有刪節。

蘇聯在1922年到 1924年間的幣制改革

阿特拉斯 合著
巴推列夫

1. 組織商品交換的經驗與貨幣經濟 的發展

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與組織商品交換

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
時期將近結束時，工業的凋
落，尤其是重工業的凋落遠較

農業爲甚。一九二〇年，工業生產量僅達戰前產量的14%，
而農業則爲戰前產量的50%左右。但是，工業的恢復却和
原料及食糧供給的可能性息息相關。因此，振興農業就成爲
恢復工業的必要條件。

餘糧徵收制沒有促進農民經濟的發展。因此，蘇維埃政
權就用糧食稅制來代替餘糧徵收制，並允許農民可以自由出
賣剩餘的農產品。於是由於允許了個人商品交換的自由，正
如列寧尙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俄羅斯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
大會上的報告裏就已預言過的一樣，當然也就是允許了一定
限度內的商業自由。

蘇維埃政權希望在和平建設的條件下，與農民交換商品

時，不再給他們『蘇維埃紙幣』，即列寧稱之爲『借據』的東西，而要給他們一些他們所必需的商品。黨很早就認爲自己的任務是要通過國家機關及合作社機關，有組織地用工業品交換農產品，用以驅除盲目的、投機的商品交換，並用這個有組織的商品交換恢復經濟，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這個有組織的商品交換，是希望在工業與農業間擠除中介人——資本家而建立二者間的直接聯繫的一個試驗。

列寧認爲：把商品交換當作城鄉間商品流通的基本形式——城鄉結合的基本形式——來應用，是一個過渡辦法，是新經濟政策所允許而由國家所組織的餘糧『自由交易』的初步試驗。

市場的發展

由於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市場已取得了合法的存在。這時私人商業發展得極爲迅速。而且把商品儲備直接交到工人手裏這一事實（根據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和五月十七日頒佈的工人實物褒賞條例），也幫助了市場的發展，因爲工人們可以把這些商品用到商品交換上。

在市場上，私商一開始就使商品交換和現金交易結合在一起：他們一方面用工業品和糧穀交換，而如果價格對私商有利時，他們並不拒絕使用貨幣。當已取得了合法地位的私人市場，利用供應機構改造的緩慢和國家及合作社組織中缺乏商業經驗等缺點，而乘機充分鞏固了它的地位時，有組織的商品交換業務，實際上已經擴展起來了。但是在國家所組

織的商品交換機構中，很快地就暴露出一些嚴重的缺點。

除了組織上的困難和熟練的商業幹部極感不足外，商品的不够齊備、對需要的估計以及制定交換等價率等問題，也是商品交換中的最大問題。

商品儲備由中央向地方的統一供給，在種類上不够齊備而且也不能使人滿意。並且，商品儲備的機械式的分配制度，使某些地區感到某種商品的過剩，而另外一些地區對該項商品却又極感缺乏，從而妨礙了商品交換的發展及糧穀的收購。

商品交換必須在中央所規定的、恰合實際地評定出來的交換比率的基礎上進行。基於這一點，創設了一些等價評定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的任務是考查商品交換市場上的交換率的變動。但是，他們實際上評定出來的平均等價，往往和地方的行情互不一致。此外，在等價評定表上並沒有考慮到同一種類商品在質上的區別，因此，就產生了惡意地利用此點的可能性。而且對商品交換的結果的考核，必然地只是表現出一個粗糙的概括的性質，並不能保證對商品交換進行狀況的確實的監督。同時，在沒有被組織起來的商品交換領域中，還乘機混入了利用有組織的商品交換的缺點，而為一己謀利的私人資本。私人資本和任何強制性的等價都沒有關聯，他們能够在他們認為滿意的比率下，在他們所喜好的任何地區內，購買或交換商品，並能利用各個地區間價格的不同與商品交換比率的差額，取得莫大的商業利潤。

商品交換在實際上轉變成商業，
過渡到國家調劑商業及貨幣流通

如果說一九二一年四、五月以前，私人市場

上廣泛地擴展着個人的不用貨幣的商品交換，那麼，由一九二一年春天起，現金交易便在各處開始驅逐着商品交換。農民都樂於在自由市場上購買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不願再到消費合作社機關中去購買為數有限的幾種特定商品（註1）。一九二一年夏天，因為市場的商品流轉擴展得非常迅速，因為蘇維埃紙幣增發數量的減少，盧布的貶值就因而緩和下來。這一點，加速了由商品交換過渡到現金交易的過程。

如果說商品交換是要受中央調節的，那麼當時國家機關及合作社組織的商業事務，却在調節和監督之外，他們只是無規律地、並且常常是非常笨拙地進行商業事務，並把一些大發其財的耐普曼——投機份子吸引到他們的周圍去。

商品交換在實際上已孕育了商業，在這一點上，私商會起了主動的作用。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調節商業，監督並限制資本主義成份參加這個商業。

我們必須從商品交換所積蓄起來的經驗中，歸納出一個實際的結論來：即改造國家機關與合作社機關，具體決定新的方法，以使蘇維埃國家能夠控制來勢洶湧的小資產階級勢力，給資本主義成份規定適當的範圍。列寧在第七次莫斯科省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論裏，曾總結了商品交換的經驗。列寧對這個經驗加以深刻的分析後，更進而說明：為走向

社會主義建設，通過商業這一『橋路』是必要的（註2）。

黨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已由商品交換的障地退却到國家調節商業及貨幣流通的障地上。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我們完全沒有提到我們的經濟應對市場和商業表示出一個怎樣關聯的問題』（註3），可是現在——一九二一年，這個問題就非常尖銳地被提出來了。列寧一面說明我們應『適應』貨幣流通中的買賣關係上的必然趨向，他並強調說：爲設法避免遭受這個趨向的『反擊』而遷就它是必要的。他要求由國家積極地對商業和貨幣流通加以調節。組織商業並支配它；調節『……目前貨幣流通的不良現象』（註4），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註1、參閱一九二一年九月八日『食品報』，第一二六號。

註2、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七——六八頁。

註3、同書第六二頁。

註4、同書第七五頁。

2、穩定盧布政策與信用制度的恢復

由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於
經濟的非實物化 是貨幣關係不僅在私人市場範圍內，而且也在業已社會主義化的經濟範圍內迅速地發展起來。大部份國營企業業已實行了經濟核算制，這就是表示着廢止生產品的國家免費供給制，廢止這些企業的資金由國

庫供給的制度。當然，只有對商品和公共設施制定收費制度，纔能保證企業經營的獨立性。這一點，已由一九二一年下半年所頒佈的一些法令實現了。起初對分配生產品給職工的配給票制度加以限制，最後則完全取消了這個制度。此時，貨幣工資已逐漸代替了實物工資，後者雖然最後在一九二二年全年中，仍在職工的收入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取消私人持有貨幣數量的一切限制，允許私人自由持有或轉讓金幣和貴金屬，這幾點，也促使貨幣流通更加迅速地發展起來。

列寧論穩定通貨的必要性及政府爲實現這個方針的第一步

列寧認爲貨幣貶值是國內經濟情況不穩定的結果，

合理地組織商品流轉，是能够健全貨幣流通、穩定盧布的（註1）。列寧指示說：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要以對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實行全民核算的方法來進行（註2），但是此種核算也只能在通貨穩定的堅固基礎上纔有建立的可能。

黨中央委員會在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後，立即設立了專門委員會，負責計劃如何進行必要的財政改革，並編製改革的初步具體計劃。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列寧所寫的『蘇聯勞動國防會議指令』中指出：建立合理的現行貨幣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它只能建立在工業與農業間的合理的相互關係上（註3）。在一九二一年五月，當中央尙忙於商品交換時，列寧就已認定了恢復貨幣流通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之一

(註 4)。

當開始走向新經濟政策時，財政人民委員會已遵照黨的指示，着手準備恢復貨幣流通的措施，特別是準備鑄造硬幣。

一九二一年六月末，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頒佈了『關於取消貨幣流通的限制及發展存款和匯兌業務辦法』的法令。在此項法令中指出：蘇維埃政權的意圖是『取消障礙經濟周轉的限制並恢復貨幣流通』(註 5)。

當一九二一年十月，黨和政府向國家調節商業及貨幣流通的障地退却後，為實現這個方針而實行了很多辦法的同時，並加強了對恢復財政制度問題的重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整理財政經濟辦法』的重要法令。在這個法令中提到：『根據新經濟政策的新方針，財政人民委員會在國家機關的整個機構中，必須把自己的活動放在力求增加人民財富收入上，把目標放在絕對地節省貨幣資金的開支上，盡可能減少紙幣發行額，並在可能的條件下，作到完全停止發行的地步，發展有利於國家經濟正常發展的那種銀行業務，來完成我們的最重要的任務』(註 6)。

從十月十日頒佈此項法令時起，黨的恢復財政制度、穩定盧布和發展信用制度的方針，已獲得了法律上的效力。列寧此時(一九二一年十月)就專心致力於黨中央財政委員會和財政人民委員會方面的工作。

國家銀行的設立

由於過渡到企業的經濟核算制和發展貨幣經濟，因而就產生了

了信用，同時也產生了建立信用制度的必要性，這種必要性無論是爲了工業、爲了商品流轉以及爲了農業，都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列寧對於國家銀行的設立曾盡了最大的努力。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二一在十月十二日公佈了關於設立國家銀行的決定，十月十五日頒佈了國家銀行法。

列寧認爲國家銀行從它成立那一天起，它的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要用鞏固的通貨代替不斷貶值的『蘇維埃紙幣』，藉以實現幣制改革。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批准設立國家銀行的決定中指出：國家銀行的任務在於促進工業、農業及商品流轉的發展，實現貨幣流轉的集中化，並實行一些其他辦法以建立正常的貨幣流通。由此可見，國家銀行不僅必須去執行信用機關的職務，而且也必須成爲一個貨幣周轉和調節貨幣流通的組織中心。從政府委托給國家銀行的任務是恢復貨幣流通這一點看來，我們就可以知道：委托給國家銀行的紙幣——信用貨幣——發行權，並不是爲了彌補國家預算赤字，而是爲了商品流轉和工業的短期信貸。

但是，國家銀行不可能立即完成這個任務。因爲，它必須首先建立起各分支信用機關，必須先教導國民經濟的短期信貸業務，教導國營和合作社營企業及機關，使它們能夠嚴格遵守信用紀律，能夠適當地、合於核算地進行自己的業務。

在通貨不斷貶值條件
下的國家銀行的活動

國家銀行在爲執行它所
承擔的任務而開始其活動的
第一年中，運用由國庫撥付

的資金和以存款及活期存款方式吸收來的資金，充作信貸資金的來源。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國家銀行擴展業務時，由國庫給它撥出『蘇維埃紙幣』兩萬億盧布，按公定比值折算，約等於二千五百萬戰前金盧布。一九二二年初，存款與活期存款約等於兩千萬戰前金盧布。國家銀行就在這樣財源極爲困窘的情況下開始了本身的業務。

這時，國家銀行仍然是用不斷貶值的『蘇維埃紙幣』放出信用貸款。這就有把國家銀行資產縮小的危險，因而當發放貸款時就必須考慮到『蘇維埃紙幣』的貶值。於是，國家銀行就規定貸款月息爲 $8-12\%$ （一年間爲 $96-144\%$ ）。但是『蘇維埃紙幣』的貶值率却大大地超過了貸款利率（按勞動統計指數，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物價上漲了 44% ，十二月上漲了 108% ，一九二二年一月上漲了 89% ，二月上漲了 112% ；而銀行貸款利率每月僅爲 12% ），因此，國家銀行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方法去防止由於貨幣貶值所引起的資產上的損失：（1）貸款的支取和償還時，要把『蘇維埃紙幣』折成黃金或按支取貸款時作爲保證的商品的價格計算；（2）銀行購存商品，要求以商品償還貸款；（3）貸放給出口業者的貸款，約定要用在國外售貨後取得的黃金或外幣償還；（4）使自己的流動資產轉化成黃金或外幣。

在通貨貶值的情況下，國家銀行的商業業務得到了極廣泛的擴展；這種業務在一九二二年末，爲銀行總資金的40%。

國家銀行在其第一年的成果中，保存並且增加了自己的資產，鞏固了它的組織（建立了許多分支行網），調節了它和各經濟機構間的商業的和借貸的關係，在商品流轉和出入口專業上取得了鞏固的地位。

同一時期中，在經濟流轉中的商業信用範圍內，發生了信用關係，即在業已實行經濟核算制的機關和企業以及私人彼此間，以信用的形式出售商品。票據是表示有義務在特定期間內，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的東西，是商業信用的工具。商業票據的存在，在商品流轉迅速加大的條件下，創造出在交易過程中代替票據而發行銀行信用貨幣——銀行券的可能性。

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的貨幣流通

『蘇維埃紙幣』的發行額
在一九二一年四月是兩千三百零五億盧布，八月是七千二百

零五億盧布，十月約爲兩萬億盧布，但是到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僅僅一個月中就發行了七萬六千九百億盧布的『蘇維埃紙幣』，即等於我國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上月末所投入流轉範圍中去的貨幣總額（九萬八千億盧布的78.6%）。然而，發行速度雖在一九二一年七、八月間已較一九二〇年增高了很多，可是物價却沒有隨之上升，甚至於在七月還降低

了2%，八月繼續降低了3%。一九二一年，盧布所以能够暫時安定的原因，是因為採用了新經濟政策，擴大了市場的流通範圍，因而也就增大了為商品周轉服務的貨幣的需要。但是，這一安定並未能鞏固，因為國家預算還未恢復正常，紙幣的發行仍然要用以彌補國家的預算赤字。

新經濟政策初期正如內戰時期一樣，貨幣的貶值，同時又釀成貨幣不足的現象。這種貨幣不足的現象，在促進以新經濟政策的經濟及財政原則代替在組織和管理方面的戰時共產主義原則的過程中，起了非常顯著的作用。地方和省的政府機關，實際上已不能僅僅依賴中央撥付經費，為滿足地方的需要，必需發展經濟的主導力量——經濟核算制，擴大市場交易，增加地方財政的收入並裁減專靠國庫供給資金的企業和機關的數量。但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條件下，地方的機關和企業是沒有這種可能性的，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和戰時共產主義條件下的貨幣不足的經濟意義及其結果在本質上的區別。

黨為改善國家預算
及穩定盧布而鬭爭

一九二二年十月，列寧在提交全俄財政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意見書中指出：如果我們

不能完成鞏固蘇維埃財政的極為困難的任務，『……無論在由國際資本主義中捍衛蘇俄獨立的事業上，無論在發展我國經濟和文化事業上，都不可能更大的前進一步』（註7）。

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三月）通過了目前財政政策的擴大計劃。其中指出：『……只有首先整理國家的一

切財政制度，特別是建立實際的預算，不使預算產生赤字，並且擴展國內的商品流轉，只有在這個基礎上，纔能制止紙幣的貶值，安定物價』（註8）。同時黨代表大會還指出國家預算所以產生赤字以及貨幣缺乏的現象，『主要是受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的影響』（註9）因而使我們不能立即實行幣制改革。

財政人民委員會根據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決定，執行了黨的指示，展開了為縮減發行、節省支出、增加稅收及其他財政收入的鬥爭。『因為各工業機構皆已實行了[經濟]核算制，因而減輕了國家開支上的難以維持的負擔，同時，並產生了國家可能向國營企業徵課稅款的條件。

地方財政制度，是根據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所頒佈的『關於地方貨幣資金』的法令建立起來的，即國家總預算不再負擔地方蘇維埃機關一切財政開支上的義務。

於是，在行政機關的開支上勵行節儉；加強財政的監察組織；同時，對社會文化費也加以縮減；並在短期內制定了課稅制度：間接消費稅、營業稅、財產所得稅以及其他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捐稅。在一九二二年又發行了一千萬普特糧穀的第一次短期糧穀公債。這次發行的公債是以貨幣賣出的，而當償還時，則按持券人的希望，或用貨幣，或在收穫後還給糧穀，因為這個公債券可用以繳納代替餘糧徵收制的實物稅，所以農民都願意購買此項公債。一九二二年的下半年，

又制定了儲蓄制度和社會保險制度，這一事實也促使國家收入大為增加。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二年間，曾發行了兩次所謂新單位紙幣。第一次發行的新單位紙幣一盧布等於蘇維埃紙幣一百盧布，第二次發行的新單位紙幣一盧布等於第一次發行的新單位紙幣的一萬盧布。列寧認為發行這種新單位紙幣是穩定盧布的一個步驟（註10），但是，因為新發行的『紙幣』仍然繼續跌價，並未能使貨幣穩定。

當時，斯大林同志是和列寧共同謀劃經濟和財政的改造工作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就已指出：『……我們如不整頓貨幣流通的秩序，改淨盧布的幣值，那麼，我國國內外的經濟事業就要成爲跛足』（註11）。真理報在一九二二年第二一五號的副頁中，掲載着斯大林同志與列寧在最後患病時談話的報導。

據斯大林同志說，列寧曾向他指示：『改善工業和財政，必須在秋收後纔能進行，目前要去裁減我們的機關和企業，並改善它的性質，使國家免去許多非必要的開支，這種事，須要我們意志堅決，然後纔能渡過這個難關，纔能確確實實的渡過這個難關。』（註12）

列寧號召堅決執行財政政策所採取的方針：必須毅然克服流行得非常廣泛的依存於通貨膨脹的想法。這些想法在定期刊物上也曾公然出現過。企圖破壞黨的穩定盧布措施的叛徒托洛茨基份子，支持着這種想法。但是列寧——斯大林黨

的中央委員會却保證執行了列寧在財政政策方面的指示。

註1、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四三頁。

註2、同書第三二六頁。

註3、同書第三六九頁——三七〇頁。

註4、同書第四一八頁。

註5、『指示與命令彙編』一九二一年，第五二號，第三〇一頁。

註6、同書，一九二一年，第六九號，第五五〇頁。

註7、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〇七頁。

註8、俄羅斯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會議錄，莫斯科，一九三六年，第五六七頁。

註9、同書同頁。

註10、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二七——三二八頁。

註11、真理報第二八六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註12、『斯大林論列寧』，『青年近衛軍』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版，第二三頁。

3、幣制改革的初步階段——切爾達

業茨的發行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列寧在精密分析黨的穩定盧布政策的時候指出：『如果

我們能够作到使盧布先穩定一個時期，然後又繼續永遠穩定下去，那我們就獲得贏局了。……那時我們就能够把我們的經濟放在堅固的基礎上，並在這個堅固的基礎上更加向前發展。』（註1）

列寧論黃金在蘇維埃
國家中的作用

貶值通貨的存在，是恢復經濟道路上的一个嚴重障礙。『蘇維埃紙幣』的日益

貶值，妨礙了建立正常的生產核算，妨礙了組織經濟核算制度及調節市場，並且也妨礙了不論在生產範圍中或在流轉範圍中和私人商業的競爭。

在通貨不斷貶值的條件下，必然地要利用黃金作為價值的尺度。因此，在計算『蘇維埃紙幣』時，就按它等於多少黃金或外幣來計算，即把『蘇維埃紙幣』折成黃金。這時，經濟契約和經濟核算都用黃金作標準，並且國家預算也是用『蘇維埃紙幣』對黃金的比值來計算（即當時所謂『以黃金計算』）的。為了相同的目的，在採用『黃金盧布』的同時，還採用了『商品盧布』的辦法。這個『商品盧布』，就是與一九一三年的物價對比，以『蘇維埃紙幣』所計算出來的物價指數。許多企業的工資，都是根據着以生活必需品價格指數所計算出來的『商品盧布』，即按職工消費品中的幾種特定商品的價格指數計算的。這一切都在說明不論在什麼情形下，實際上黃金已被當作了價值的尺度。

列寧和黨認為國家積蓄黃金並加以合理的運用，是一個

最重要的經濟任務。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列寧曾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一篇『論現在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黃金的作用』的論文。這個事實本身就證明了列寧和黨當時是如何地重視黃金問題。

新的整個的經濟任務，也重新提出了貨幣及黃金的問題。列寧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寫道：蘇維埃政權在全世界範圍內獲得勝利後，就沒有再去積蓄無用的黃金的必要了。『目前，蘇俄還需要黃金，我們要把它高價賣出，較便宜地購入商品。因為我們和狼住在一起，就得學狼叫，這樣做，爲的是要把狼一網打盡。既然是處在詭計多端的人間社會裏，就要遵守那句賢明的俄國俗話：不要在上戰場的時候誇耀，勝利歸來時纔可以誇耀。』（註2）

關聯着在世界經濟中兩個制度並存的問題，關聯着在世界範圍內『誰戰勝誰』的問題，列寧提出了黃金問題。列寧當然早已考慮到在蘇聯國外、在世界市場上還使用着黃金，而『我們並不能立刻和資本主義世界斷絕經濟上的關聯，因此我們必須儲備黃金。』『……把它高價賣出，用它較便宜的購入商品』。按着列寧的意見，只有當國家爲獲取商品而需要黃金時，纔可以利用；因此，當用蘇維埃紙幣能夠購得商品時，就消失了消費黃金的任何根據（註3）。列寧認爲合理地運用國家的輸出儲備，獲取爲輸入工業設備時所不可缺少的黃金和外幣，是具有巨大意義的。

『儲備黃金』；把黃金集中到國家手裏；爲經濟的恢復

與社會主義工業化而把黃金用到國際市場上去；這些口號，就是由斯大林同志所領導，並和各式各樣反革命派別作無情鬭爭的黨所實際實現了的列寧關於黃金的指示。

切爾達業茨的發行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曾經寫過，在金幣的基礎上恢復穩固的貨幣流通是必要的。由於允許黃金的自由持有和轉讓，因而就能夠把金幣（以及在黃金的基礎上保持着穩固比值的外幣）吸引到流轉範圍中去。但是因此却又造成了把『蘇維埃紙幣』——蘇維埃通貨排出流轉範圍的危險。爲了預防這個危險，我們不能等到國家預算完全恢復，不能等到爲彌補預算赤字的『蘇維埃紙幣』的發行完全停止，我們必須與『蘇維埃紙幣』相並行，建立在國內流轉範圍中能夠代替黃金地位的穩固的蘇維埃通貨。這樣的通貨，只能是以黃金或貴重物資作擔保，並且在爲調劑商品流轉的目的下，經過銀行短期信貸機構所發行的銀行通貨——信用貨幣。我們已經指出過：發行這種貨幣的條件，在一九二二年就已經建立了起來。

國家銀行遵照政府的指示，從一九二二年夏季起，就已着手準備發行銀行券。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決定把銀行券的發行權委託給國家銀行。國家銀行實際開始發行銀行券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末。根據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一日所頒佈的法令，銀行券的發行目的在於增加國家銀行在商業業務上所必需的周轉資金。國家銀行只能在以不得少於50%的貴重金屬作保證的條件下，纔可以爲國庫的

短期借款自由發行銀行券。這次發行的額面十盧布的銀行券，叫作『切爾達業茨』，等於七·八二二四公分純金，即等於戰前的十盧布金幣。

法令中規定；銀行券的足額準備中，以貴金屬及穩固的外幣充當準備的比率，把它折成黃金計算，不得少於25%，其餘額可以易於銷售的商品、短期票據及其他短期債券抵充。而且當法律規定國家的稅金須以黃金繳納時，銀行券得以額面價值充當黃金使用。根據這個法令，國家銀行為辦理國民經濟的短期信貸，可以行使發行權。

國家銀行首先必須使銀行券在流轉過程中獲得鞏固的地位。到一九二三年夏天，切爾達業茨在流轉範圍中的『獲取鞏固地位』的過程已告完成。切爾達業茨在流轉範圍中已被認作和黃金有同等價值的穩固通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與已發行的切爾達業茨相並行，又發行了一種叫作『運輸幣券』的額面五盧布的特種幣券，鐵路方面規定可以用它付款。這種幣券事實上已被視作小額切爾達業茨而在市面上流通。

切爾達業茨所以能夠有所成就和它所以能在流轉範圍中迅速代替黃金及外幣的基本原因，是因為蘇維埃政權規定所有蘇維埃經濟機關必須把切爾達業茨當作與黃金等價的硬幣收受。國家銀行向自己的顧客——經濟機關，支付切爾達業茨，把它當作與黃金等價的穩固通貨看待，同時自己也按相同的比值收納。因為國家處於控制著經濟命脈的地位，這就

足能迫使私商——耐普曼不能不承認蘇維埃銀行券是穩固通貨，因為私商也能用切爾達業茨按指定對黃金的比值，購買蘇維埃各企業所出售的商品。私商不僅能用、而且必須按銀行的規定用切爾達業茨償還自己在商業上和銀行貸借上的債務。這一切都促使在商品流轉日趨繁榮的條件下，對已經成為穩固通貨的切爾達業茨，不僅在蘇維埃企業方面，而且在私商——耐普曼方面，也都是痛切需要的。假如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當時用國家銀行庫存的黃金和外幣充當迅速增多的銀行券的發行準備金是不够用的，但是，這些準備金在蘇聯却够用了。因為國家銀行為保持其銀行通貨的穩固幣值，除金準備外還運用了一些在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的那種可能性。當時國家所握有的大量商品，就是保證穩固的蘇維埃通貨——切爾達業茨的最重要的條件。

註 1、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四六頁。

註 2、同書第八三頁。

註 3、同書第二四九頁。

4. 一九二四年幣制改革完成的前提 條件

貶值通貨在經濟上和工人階級
與農民的結合上的否定的影響

貶值通貨和穩
固通貨[的]同時並
存，否定地影響了

經濟的發展。切爾達業茨直到一九二四年以前，主要的還是一種『城市的通貨』，而蘇維埃紙幣則幾乎是獨佔式地保持着它在鄉村中的地位。城市不斷地需要並佔用着切爾達業茨，致使它的流通不能在鄉村中得到發展。並因為切爾達業茨的票面額過大，更使它難於流入鄉村。而且由於穀物價格低廉，農民的收入很少，切爾達業茨很難接近廣大的勞動農民羣衆。鄉村中沒有任何方法能夠防止他們貨幣收入的貶值；可是城市，在一九二三年就早已有了很多防止貨幣收入貶值的辦法；例如，用商品盧布，繼而用切爾達業茨作標準計算工資，又如國家儲蓄銀行接受人民用蘇維埃紙幣折成切爾達業茨的存款，即把蘇維埃紙幣折成切爾達業茨存入銀行。在流轉範圍中，貶值通貨的存在，束縛了農產品商品化比率的增高和貨幣經濟在鄉村中的發展。造成了城鄉『分裂』的危險。由此可見，實施單一的穩固通貨制度對於城鄉間的結合，將有如何巨大的影響。『鄉村中的商品交易和貨幣流轉的速度是很緩慢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使用蘇維埃紙幣，就得忍受巨大的損失，如果不使用蘇維埃紙幣，就得忍受許多經濟上的困難。穩固的通貨可使農民免受損失。當穩固的貨幣進入小額的鄉村交易中時，它就能促進鄉村商業的發展，它就能在較為健全的基礎上改建商業。穩固的通貨使農民有儲蓄的可能，以便改善其本身的經濟。』（註1）

在流轉範圍中，和蘇維埃紙幣相並行而發行切爾達業茨，這就給通貨自由買賣的市場，造成了一個好機會。同一

通貨在各個不同的市場上存在着不同的比值，再加上許許多多貨幣間的不同的比價（蘇維埃紙幣對切爾達業茨，切爾達業茨對黃金等），交相競賽，這就是這一時期的一般情況。

在通貨投機的空氣極為流行的情勢中，國營企業、工業和商業企業的活動，帶有一些不正常的現象。貨幣相互間比值的差額，每天可造成3—5%的利潤或損失，這就看某些企業能否把他們所存有的蘇維埃紙幣及時地換成切爾達業茨來決定。

貶值通貨和穩固通貨的並存，也否定地影響了工人階級的情況。工資的大部分是用蘇維埃紙幣而不是用切爾達業茨支付的。工人們為預防其工資遭受蘇維埃紙幣貶值的影響，他們都樂於領取實物勞動報酬，而不願領取貨幣。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實物工資在某些地區如在烏拉爾一帶，已佔全部工資的75%。

農民也是如此，他們都設法避免把農產品換成蘇維埃紙幣，藉以預防其收入的貶值。這一點，使國內經濟的非實物化過程、貨幣關係的發展和商品流轉的擴展受到了束縛。

一九二三年的物價
調節和銷路危機

在流轉範圍中，這時已停止了退却而轉入了進攻，這就是表示必須以適合於市場的法

則性為原則，主動地調節市場。正如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所指出：『爾普曼並不能自主地影響市場，因為它不是生產者』（註3）。這時蘇維埃政權已經大大有了調節市場的

可能性；然而，直到一九二三年以前，這個可能性並未得到充分地利用。許多蘇維埃機關，在叛徒托洛茨基份子的推動下，實際上採用了『發財吧』的原則，並因其他種種原因而以獨佔的方法提高了物價，因而生產停滯，並形成了工農業產品間的『剪刀價格』。

一九二三年的秋天，經濟上的困難日益加多：『……農民購買城市的商品對農民是不利的，因此，他們就停止購買。因而發生了「銷路危機」，影響了工業。』（註3）這個『銷路危機』一方面破壞了整個經濟建設，同時又分裂了工人階級和農民間的結合。私人資本巧妙地利用了這一方面的困難，把持了商品流轉部門中的許多地盤，而且蘇維埃機關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及耐普曼的代理人，又在私商反對國營及合作社營商業組織的鬭爭中，極力支持私商。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指出：所謂一九二三年的『銷路危機』和私商勢力擴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們的國內商業調節委員會庸懦無能（註4）。

爲了克服一九二三年的『銷路危機』，必須加強國家對物價的調劑，減低工業品的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提高農產品價格，用以迅速縮小『剪刀價格』的差額。爲此，不但必須改善工業生產（減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且還要在流轉範圍中，積極改善運輸系統，銀行貸款，貨幣流轉，並和私人資本進行主動的鬭爭。國家銀行對『生產過剩』的企業減少貸款，一方面並以這種方法迫使降低售價和

銷售庫存品。這一些方法都產生了肯定的效果。但是爲了徹底解決這一時期的經濟上的困難，仍然在於完成幣制改革。

完成幣制改革的
經濟前提和條件

由於工業、運輸業和農業的
恢復而得到的顯著成果及一九二
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間商品流轉的

發展，創造出許多爲完成幣制改革所不可缺少之經濟上的前提條件。

當時在財政方面和貨幣流通方面，有利於完成幣制改革的優越條件，有下列各點：（一）靠發行蘇維埃紙幣彌補的預算赤字不斷減少；（二）大量貨幣在流過程中的實際價值顯著增高；（三）國家銀行所儲備的黃金和外幣迅速增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共存有一千九百三十萬盧布，而到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實施幣制改革之前，已存有一億五千三百五十六萬盧布；（四）對外貿易出超。

但是這些經濟上與財政上的有利條件，僅其本身並不足以保證幣制改革的成功。爲了勝利地完成幣制改革，還必須克服許多經濟上與財政上的嚴重困難。

國家銀行的金準備，在幣制改革前夕；等於沙俄時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金準備的 3.7%，等於一八九七年幣制改革時的 13%。爲使蘇維埃貨幣保持它在黃金基礎上的穩固幣值而不依靠金準備，必須克服許多財經方面的困難。因此，必須保證巨額的、持久的對外貿易的出超，對能够大大影響國內市場情況的出入口事業，必須加強出口，限制入

口。同時我們又不能不顧及到在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內戰爭以及新經濟政策頭兩年這一時期，由於紙幣的巨額發行及貶值，致使人民（尤其是農民）對紙幣喪失信用的這一事實。

還有一點須要附帶說明，這就是到實施幣制改革之前，預算赤字雖然已大大縮減，但仍然未能達到收支平衡，它是穩固通貨、尤其是用穩固通貨代替跌價通貨的初期階段的一個嚴重威脅。

切爾達業茨的地位，直到實施幣制改革時，還未十分穩固。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在莫斯科的市場上，十盧布金幣可換十四盧布十哥比切爾達業茨，而在其他各地，它的交換比率還要高。

幣制改革前夕『剪刀價格』的差額已經縮小了。這是一個肯定性的因素。但是，農產品價格的上昇超過了工業品價格的下降，因此物價水平由一九二三年十月起直到實行幣制改革前，又在不斷上漲。

一九二四年初，商品的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之間，已形成了很大的差額。這個價格的差額，也給幣制改革的勝利完成造成了嚴重的困難；第一，因為工業品價格的減低難於直達消費者；第二，因為它易於增加私人資本的積蓄，加強了私人資本在反對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減低物價和提高切爾達業茨購買力政策的鬭爭中的地位。

私人資本對於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幣制改革抱着極端敵視的態度。貶值通貨的存在對私人資本是有利的。因為他們

可以在易於銷售的商品價格上漲時，乘機搗把，他們由國家機關借用的商業和銀行的貸款，即其本身的債務日益貶值，並可以利用通貨幣值的變動，大大獲利。而且貶值通貨正如給投機爲行、給掠奪中農和貧農、給高利貸的剝削，建立了有利的條件一樣，對富農也是同樣有利的。富農在通貨貶值的條件下，貸出實物，這種貸出形式就是一種最殘酷的高利貸的剝削方式。

由此可見，耐普曼式的資產階級和富農階級是這一時期爲完成幣制改革所必須擊敗的非常有力的一種經濟上的反抗勢力。耐普曼式的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就是祖護他們的利益、對幣制改革激烈反抗的、但終於在由斯大林同志領導下的黨所揭露並擊敗的托洛茨基份子。

蘇維埃國家依恃它處於控制着經濟命脈的地位，確有力量，能夠充分地補充財政貨幣後備力量的不足，並使克服幣制改革道路上的許多困難成爲可能。

蘇維埃國家能夠提出並且能夠完成以調劑商品批發價格和零售價格的方法，穩定通貨購買力的任務。

蘇維埃國家，因其處於控制着經濟命脈的地位，所以能把大量商品靈活地運到市場上去；用這種方法，保證減低並穩定物價水平的政策，能夠收到實際效果。對外貿易的獨佔，保證了國際收支方面的措施能夠成功；這一點，是能夠鞏固蘇維埃通貨在通貨市場上的比值，製造有利的條件的。在集中領導下銀行分支行網所實行的國家信貸制度及股

票交易所的國家管理，保證在全國通貨市場上起迅速、統一作用的措施，能夠執行，並使建立廣大陣綫，反對投機份子——想在新蘇維埃通貨貶值時，乘機搗把的人們——的鬭爭，成爲可能。

其後，蘇維埃政府不僅完全得到了工人階級和農民對幣制改革的同情，並且得到了勞動人民羣衆積極參加爲勝利完成幣制改革而反對私人資本的鬭爭。在每一城市和每一鄉村中的工人和農民的代表蘇維埃、黨組織和職工會組織的存在，是黨和政府手中的巨大政治力量，這一力量，在實行爲使幣改獲致成功所不可缺少的財政經濟措施時，能夠生出足資憑藉的經濟槓桿作用的效果。在某些情形下，例如檢查商品零售價格的時候，這些勞動人民的羣衆組織，能夠起、並且實際已有效地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於是，爲勞動人民的利益而進行的幣制改革和穩定幣值的工作，這纔真正地成了勞動人民羣衆本身的事情。

蘇聯各民族的政治團結，也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一九二二年蘇維埃聯盟的組成，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所決定的蘇聯財政人民委員會的成立，促使幣制改革易於在蘇聯所有加盟共和國內，在統一的原則下實現，保證了爲完成幣制改革所必須的財政經濟措施的統一集中領導，使黨能夠獲得全蘇六十種民族的勞動人民羣衆對幣制改革的支持。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一個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有利於幣

制改革的財政經濟方面重要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對沙俄政府及臨時政府的所有外債宣告無效。

俄國在戰前每年約支出四億金盧布，其中償付外債本利金爲二億一千四百萬金盧布；俄國由於軍事借款和這些外債的利息累積，到十月革命當時，對外債務已達一百六十億金盧布。當一個僅有一億五千三百萬金準備，却有龐大數額的外債的資產階級國家，如果不藉助於千百億萬金盧布的新外債，那麼，它就根本不能進行、而且也根本不能提到幣制改革。但是相反的，蘇維埃國家一開始就廢除了以前政府的對外債務，由外債和利息的桎梏下把我國解放出來，這一點，對於幣制改革的實施，是有莫大的幫助的。

以上就是蘇維埃國家爲完成幣制改革所具有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前提條件。黨對橫在幣制改革途上的許多嚴重困難並不畏懼，並且通過了完成幣制改革的決定。

註1、聯共（布）中央文件集，『聯共（布）關於經濟問題的指示』。莫斯科，一九三一年，第一六三頁。

註2、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三三頁。

註3、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二五三頁。

註4、斯大林：聯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總結，一九二四年，第一三頁。

5、一九二四年幣制改革的完成

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及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幣制改革問題

蘇維埃政府根據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三次黨代表會

議（一九二四年一月）及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二月）的許多決議，自一九二四年二月起從以個別方法改善貨幣制度的辦法（兩次改變新貨幣單位、發行切爾達業茨和運輸幣券）轉入了完成幣制改革的必要步驟，全面進行改革貨幣制度。

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批准了政府爲實施幣制改革而採取的財政政策。『蘇維埃代表大會認爲：在最短期間內完成幣制改革，完成已正確地開始了的用切爾達業茨代替貶值紙幣的工作，並發行穩固的國庫幣券，用以整頓貨幣流通狀況，是我們的最重要的頭等經濟任務。大會……規定了所有國家機關及國營企業，必須竭力協助財政人民委員會完成這項任務。』（註1）

俄羅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認爲，勝利地完成幣制改革，是有巨大的政治意義的，同時並向所有的黨組織發出指示；黨在這一指示中指出：『爲使幣制改革成功，——這是爲鞏固蘇維埃通貨而與市場的盲目性作鬭爭的勝利——僅僅依靠財政措施是不能得到保證的，而且幣制改革的意義也遠遠地超出了財政政策的範圍；……爲鞏固通貨而鬭爭的勝利，只能在黨的團結一致的行動下，大大發揮大量黨員爲鞏固通貨而鬭爭的領導作用，纔能達到；這是毫無疑問

的。』（註 2）

關於幣制改革
的主要法令

幣制改革是根據政府的下列幾項法令所實現的（即完成的）：

（1）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公佈的宣佈發行幣值一、三、五金盧布的國庫幣券的法令。

新紙幣和『蘇維埃紙幣』不同，它必須在適合於商品流轉需要的條件下，纔可以發行。新紙幣被規定爲：按該紙幣的黃金實價，有作爲法定支付手段的能力（法令第二條）。財政人民委員會的發行權的限度，被規定爲不得超過切爾達業茨在流轉過程中的總額之半（法令第三條）。

爲了適應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幣制改革計劃，蘇聯勞動國防會議同時——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通過了關於初次發行國庫幣券二千萬金盧布的決定，二月二十二日又通過了發行第二次國庫幣券二千萬金盧布的決定。

（2）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發佈了『關於由二月十五日起，停止蘇維埃紙幣的印刷及發行』的命令：命令中規定中央及地方所存有的蘇維埃紙幣，應即銷毀。

（3）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頒佈了關於鑄造及發行銀幣及銅幣的法令。

（4）一九二四年三月七日，蘇維埃人民委員會頒佈了

關於按一定兌換率由流通過程中收回蘇維埃紙幣，並禁止蘇維埃紙幣流通的法令。此種兌換率由三月十日起，規定為一金盧布（國庫幣券）等於一九二三年所發行的新單位紙幣五萬盧布，即此種紙幣的五百盧布等於一哥比。殘餘在流通過程中的蘇維埃紙幣，准許在四月十日以前按前述兌換率收兌。

因為一九二三年發行的新單位紙幣一盧布等於發行新單位紙幣以前所發行的紙幣的一百萬盧布，所以，由幣制改革所表示出來的盧布的貶值（新單位紙幣不計算在內），按五百億盧布的幣值等於一金盧布計算，盧布已貶值了五百億倍。

為保證新通貨的
穩固性而鬭爭

為保證幣制改革的成功，必須一方面使新通貨保持它對黃金及外幣的穩固比值，另一方面又

必須穩固它的購買力。為鞏固財政紀律、節省支出的鬭爭，在極短的期間內，就已有有了很大的成就，由於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使政府從一九二四年七月起，就已有不再依靠發行國庫幣券彌補預算赤字的可能性。這一點是在財政方面為保證幣制改革長期勝利事業中的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在國庫幣券與切爾達業茨之間規定着一定的比價，即一個切爾達業茨等於國庫幣券十盧布。在一九二四年的一整年間，已確實地提高了國庫幣券及切爾達業茨對黃金及外幣的比值。黨在反對叛徒托洛茨基份子的不斷的無情鬭爭中所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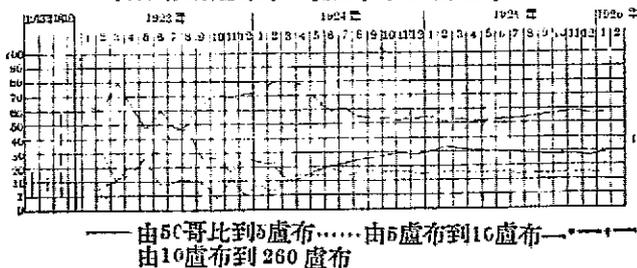
行的對外貿易出超政策，也促使切爾達業茨及國庫幣券的幣值日趨穩固。

財政人民委員會及國家銀行在調節貨幣上所犯的錯誤和小額通貨不足的危機

以季諾維也夫派的索克羅尼可夫（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大批以尤

洛夫斯基爲首的不折不扣的機會主義者和立憲民主黨員型的資產階級的財政工作者）爲首的財政人民委員會和國家銀行，當實施幣制改革時，在調節發行限度和規定票面額時犯了錯誤。正如下列統計表所表示出來的一樣，在幣制改革期間，額面較小的紙幣在貨幣總量中的比率，不但沒有增高，恰相反，却降低了許多。雖然財政人民委員會和國家銀行確有一切材料，能够事先證明由於幣制改革的完成，貨幣流通的容量要必然地增加，交易方面對穩固通貨的需要不可避免地要加大起來，但是，它們却人爲地抑制發行，造成了小額通貨的饑餓，因而發生了尖銳的小額通貨不足的危機，這一危機的發生，無論是用蘇維埃經濟的任何特點，都不能說明的。

貨幣票面額構成的百分比 (以切爾達業茨的盧布單位計算)



由於財政人民委員會及國家銀行的錯誤所引起的小額通貨不足的危機的尖銳化，產生了毀壞幣制改革的危險。小額通貨不足的危機引起了：（一）各地區大量發行貨幣的代用物；（二）出現了國庫幣券的交換率；（三）鼓勵了通貨市場上的投機行爲；（四）使中央在執行幣制改革的經濟任務時，遭到嚴重困難，同時，貨幣不足也使商品流轉難於擴展；（五）由於流轉過程中貨幣的不足，在鄉村中出現了經濟實物化的傾向。

城鄉中的資本主義成份乘機把經濟中所發生的這種病態現象，利用到反對蘇維埃政權在幣制改革期間所實行的財政經濟政策的鬭爭中去。這種在調劑發行方面的嚴重錯誤，到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得到了糾正，即小額通貨的不足現象，已因發行了足夠用的小額貨幣和國庫幣券而消除了。

爲減低及穩定
物價而鬭爭

爲了調節市場價格，在幣制改革的過程中，曾靈活地運用了國家爲國內貿易所儲備的大量商品。動員了所有一切商品儲備；把商品運到極感需要的市場上去拋售；用這種方法打擊了抬高物價的投機行爲，並且達到了降低該市場價格的效果。在同樣的目的下，又把準備運銷國外的商品、尤其是穀物的一部份，拋售到市場上去。

這種靈活地運用商品儲備（穀物、白糖、布類等）的辦法，直接地促進了工業和商業的銷路擴大和價格的降低，並且迅速地產生了肯定性的效果。根據報章的記載，從一九二

四年三月末起，許多地方的私人資本就已被迫而降低了售價。

國家的批發商業組織允許私商可以向它賒購商品，但同時却要求私商必須在指定價格的最高限度以下出售，如果不履行此項規定，則停止交付商品。國家銀行和特種銀行對減低物價會盡了極大的努力。國家銀行利用公司間的款項往來在財政上必須依賴國家銀行機構的關係，因而不僅影響了私人批發商業，而且也影響了小的資本家企業和手工業企業。國家銀行利用私商在貸款、票據貼現及再貼現方面必須依賴國家銀行這一點，迫使私商或是聽從國家在價格方面的要求，或是停止借用國家銀行的貸款（商業的及銀行的），而那些企業如果沒有這種貸款是不能够存在的。國家銀行在幣制改革期間，大大地縮減了對私商的貸款數額，以從這裏騰挪出來的資金，加強對國營工業、商業、合作社的貸款。例如北高加索，在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起到一九二四年九月一日止這一期間，私商對國家銀行的債務，已由七百萬盧布減低到二百萬盧布，而在同一期間，國營機構及合作社機構對國家銀行的債務，則由一千九百六十萬盧布，增加到三千七百四十萬盧布。國家銀行已把私商在貸款中的比率由 26.1% 減低到 5.7% 的地位。蘇聯其他各地區的情形也是如此。

在幣制改革期間的銀行信用貸款，大大地鞏固了社會主義部門在它和資本主義成份作競爭式的鬭爭中的地位，而這

一點也是保證減低物價及鞏固通貨政策能夠得到勝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蘇維埃國家在和私人資本作鬭爭時，也使用了賦稅這一工具，即以財政上的措施影響（增加課稅）商業店舖，尤其是對國家物價政策起反作用的規模較大的私人商店。對交通工具的管理，也起了不算小的作用，它使國家有可能把商品迅速運往迫切需要的地方，並能阻止私商的投機性的貨運。國家商品交易所機構，對於管制物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二四年曾有百餘處商品交易所）。國家規定了所有交易所以外的批發交易須向交易所登記的辦法，這個辦法使國家對各地區的商品流動方向和私商貨物的售出情形，有了進行考察的可能。

黨堅決地為從商品流轉範圍中，以國營及合作社營商業機構排擠批發及半批發的私人商業資本而鬭爭。在這一向私人資本的進攻中，又明確地表現了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一個為建立社會主義的政策）的第二方面，即否定了托洛茨基份子、右派叛徒、社會主義修正派。同時這一向私人資本的進攻，是為順利完成幣制改革所必需（註3），而幣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又是為這一進攻的進一步的發展，創立了前提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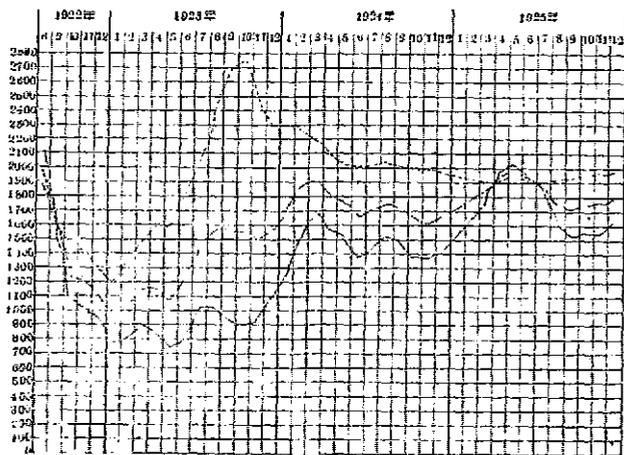
私人資本想破壞幣制改革的企圖是失敗了。正如下表所顯示的一樣，批發價格降低了，並且進一步地穩定下來。然而，不祇是批發價格，商品的零售價格也降低了，並進一步

地穩定下來。勞動統計局的零售物價指數已由一九二四年三月的 212.6% 降低到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 196.9% (一九一三年價格 = 100)

蘇在爲實現幣制改革而反對市場的盲目性的鬭爭中，獲得了大規模的勝利。

蘇維埃政權在幣制改革期間，首先依靠了只有蘇維埃國家纔能辦到的，把國家所掌握的大量商品靈活地拋入市場的方法，得到了整頓幣制的經驗。

國家計劃委員會全蘇批發價格指數， (以切爾達業茨計算，1913 = 1000)



——農產品 工業品 - - - - -平均

註 1、蘇維埃代表大會的法令及決議，莫斯科，一九三五年，第三〇五頁。

註 2、『幣制改革』文集，列寧格勒，一九二四年，第五——六頁。

註 3、參閱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及全會的決議及決定集，第一部，第五八三頁。

6. 幣制改革的歷史意義

幣制改革的實施，到一九二五年初已經完成。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五年四月）指出：幣制改革的成就，『……給經濟的更進一步發展，建立了堅固的基礎，打開了蘇聯經濟建設方面的新的一頁』（註 1）。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指出：『……不僅沒有得到外國的援助，而且還是在財政封鎖的條件下』，『……聯盟已經完全達成了它在貨幣流通方面的改革』。幣制改革『……是國民經濟和國家經濟所有各部門更加迅速和更加確實的高漲的基礎』（註 2）。

幣制改革的階級
內容及其歷史意義

蘇聯的幣制改革，就其階級內容來說，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制改革根本不同的。由於實施幣制改革的結果，究竟那一個階級的利益受到了抑制，而那一個階級又因此而獲得了利益呢？

由於幣制改革而受到損失的：第一是耐普曼式的資產階級，他們失掉了投機利潤，並在經濟範圍中、尤其是在商品

流轉範圍中失掉了許多地盤；第二是鄉村中的富農階級，他們會以投機商業和實物高利貸（秋收後貸出穀物）作手段，利用蘇維埃紙幣的貶值和商品交換，掠奪並奴役中農及貧農。

由於實施幣制改革的結果而得到利益的：第一是工人和職員，因物價降低而實際工資增加了；第二是勞動農民，他們得到了廉價的商品，並得到了以穩固通貨銷售其產品的保證。農民並能從高利貸的盤剝下解放出來，因為他們通過農業信用合作社組織，得到了國家用穩固通貨貸與的利息極為低微的農業貸款。

幣制改革對農業的發展，對加強工人階級與農民的經濟聯盟，是有巨大意義的。農民已實際感覺到銷售農產品的市場條件，大見改善。已不再因蘇維埃紙幣的貶值而受到損失。工農業產品間的『剪刀價格』已大大地縮小。消費合作社在鄉村中的鞏固與發展，限制了商人和富農以剝削勞動人民為生的可能性。直到實施幣制改革以前，消費合作社並未能在鄉村中充分地得到順利的發展，並未能和富農及商人進行勝利的鬭爭。至於對農民的市場情況究竟改善了多少，可由下面的例子裏看出來：到一九二五年七月，農民在為換取某些工業品（糖、燈油、肥皂）所用的麵粉數量，已較少於戰前，而其他商品，用麵粉所表現的價值，已接近於戰前。

工業產品的『銷路危機』已經完全消除，工業在此時已經趕不上農民購買力的增加了。

私人資本在批發和零售商品交易中的作用，在幣制改革

以後已經低落下去，社會主義成份——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的地位，在同一範圍內已擴大並鞏固起來。私人資本在零售商品交易中的比率，已由75.3%降落到幣改期間的54.9%，到幣改後的第一年，就已降低到42.4%。國家商業機構及合作社的作用，却反比例地增大起來。

就這樣，幣制改革鞏固了社會主義在國內和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它證明了蘇聯不用外債而進一步地發展經濟是可能的；它證實了蘇維埃經濟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尤其是證實了財政和貨幣流通方面的優點。幣制改革消滅了城鄉間的通貨壁壘，並在城鄉間架設了一座通貨的橋樑，鞏固了工農間的經濟聯盟。幣制改革給領導經濟的實際計劃，建立了鞏固而現實的基礎。

幣制改革後，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個經濟年度，是在整個恢復期中工業高漲最為迅速的一年。這一年中，建立了生產計劃的工業生產量，較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增加了57%。我們應該知道：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工業高漲，是和銷路、工業核算、銀行信貸、籌措資金等方面，即工業活動的財政經濟條件的健全化因果相關的。

穩固通貨為工業核算、工業管理、編製工業計劃，尤其是為按勞動的質量和數量而區分貨幣工資，鼓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建立了堅固的基礎。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工業品的成本，減低了近20%，一九二五年的工業勞動生產率，已

達戰前水平，幣制改革後，實際工資增加了，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中，已經達到了戰前的水平。

由此可見，幣制改革，正如聯共（布）中央的文告中所指出的一樣，是蘇聯政治經濟發展上的一個轉折點（註3）。

註1、參閱聯共（布）代表大會、代表會議和全會的決議及決定集，第二部，莫斯科，一九四〇年，第十四頁。

註2、『商業與財政』文集，莫斯科，一九二七年，第八四頁。

註3、聯共（布）中央關於幣制改革的文告，參閱『幣制改革』文集，列寧格勒，一九二四年，第三頁。

譯自『蘇聯的貨幣流轉與信用』（莫斯科，國家財政出版局，一九四七年版），本文為其第五章的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節。

一九四七年的蘇聯幣制改革

B·加 千 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蘇聯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實施幣制改革和廢除食品、工業品配給制度』的決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實現與全面過渡到不用配給票的統一減低價格的、擴展的蘇聯商業。從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一週裏，全蘇實行了（在兩週之內完成這項工作的邊陲各區除外）以業已貶值的舊幣，兌換一九四七年發行的具有充足購買力的新幣的工作。在發行新幣的同時，並重新折算了居民在蘇聯儲蓄銀行和國家銀行的存款與活期存款，以及各合作企業、各團體和集體農莊的活期存款、存款贖賤等款項。此外，並更換一九三八年的國家有獎公債，以及宣佈過去所發行的所有公債將全部實行更換（恢復和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第二次國家公債除外）。

幣制改革實施的迅速及其效果的巨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雄厚實力與蘇聯經濟不可動搖的穩固性的嶄新而鮮明的表現。它證明了恢復與發展蘇聯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已被順利執行，而這一計劃是幣制改革成功的基礎。伴隨着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實施幣制改革的配給制度的廢除，對於蘇聯國民經

濟和蘇聯人民物質福利的加速提高，對於所有國民經濟各部門的五年計劃按其指數的先期完成，創造了極重要的補充條件和刺激。

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是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對於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水準一貫關懷的嶄新而鮮明的表現。它贏得了所有蘇聯勞動羣衆的一致支援和熱烈贊助。我們的國外朋友也把它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來慶祝。

× × ×

『一九四七年幣制改革的使命，在於肅清貨幣流轉範圍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果，恢復蘇聯盧布的十足購買力，和順利地過渡到不用配給票的統一價格的商業。』——這是蘇聯部長會議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在實施幣制改革的決議中所規定的幣制改革的主要任務。

戰爭引起了生產構成和社會生產品分配的根本變更。它要求軍需品特別高度的擴展。由於經濟的戰時改造和國內若干省、地區的暫時被敵人侵佔，降低了一般的生產水準。因此在戰爭的第一階段中，民需品生產額銳減，某些種類民需品的生產完全停頓。一九四〇年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生產佔全部工業總產量的 34%，而一九四二年則減至 20%。

蘇聯國家預算的最重要特點之一，是蘇聯預算收入的基礎係由社會主義經濟的企業與機關所繳納的款項所構成；此種收入的絕大部分和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量與生產品的銷售具有直接關聯。因此輕工業、食品工業的生產量和農產品的

儲備量起了頭等作用，因為在國民經濟其他部門中所造成的蓄積的主要部份，是具體的表現在這些工業部門和糧食儲備機關的總收入上。例如一九三九年，食品、肉酪、紡織、輕工業等工業生產量和儲備量的比重，在總生產量中為 36.8%，貿易稅的收入為 8.7%。

總生產量，特別是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生產量的減少，使取自社會主義經濟的預算收入，從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五百八十億盧布，銳減至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另八十億盧布。而與此同時，從戰爭開始的第一天起，戰爭却要求激劇增加軍費。軍事支出即直接戰費，從一九四〇年的五百六十七億盧布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另八十四億盧布。由於戰時戰勤人員家屬津貼的支付、衛國戰爭中的殘廢軍人和衛國戰爭前線犧牲的戰勤人員家屬的撫金支付，使國家社會撫恤事業的支出也激劇地增加起來。此外經濟的戰時改造、企業基地改建以及居民向國家東部地區的撤退等，都向國家預算提出了供給巨額經費的要求。

在衛國戰爭的第一階段中，軍費的激增引起了所有其他預算支出的銳減。但預算總支出並沒有減少，相反地却從一九四〇年的一千七百四十三億盧布增至一九四三年的一千八百二十二億盧布，當時雖然居民的貨幣收入增加，但是預算的經常收入卻從一九四〇年的一千八百億盧布減至一九四二年的一千六百五十億盧布。因此必須發行貨幣以供應軍費的支出；流轉中的貨幣數量便大量地增加起來。而由於零售商

品流轉量減少的結果，經濟週轉的貨幣需要量却銳減了。

社會生產品的分配，直接依賴於生產構成和生產量。由於輕工業、食品工業生產品的減少，個人消費的社會生產品總量也減少了。與此同時，在社會生產品總量中，蘇聯軍隊的被服供給的比重增大了，這表現了戰時經濟的特色。在市場上供應民需零售的個人消費品總量，由於軍隊的需要而減少了。

由於貨幣流通量較戰前增加、零售商品交易較戰前減少的結果，造成了貨幣數量不能和經濟週轉的正常需要相一致的情況。況且侵略者在暫時佔領的區域中發行了偽幣，因而越發增加了在流通過程中的過剩貨幣，堵塞了流通的溝渠。

爲了保證居民從社會主義經濟的企業、機關、和行政機關領到的實際工資和其他的貨幣收入的穩固水準，蘇聯政府『在戰時經濟期間，不論商品的實際價值和生產費如何』（註一）使國家零售價格保持了戰前的水準，並在一九四一年實行了定量供給制（配給制度）。

在配給制度下，國家供應民需的商品總量不能充分滿足所有人民的商品需要，於是市場的需要激劇地增加了，首先是食糧。在商品市場供給不足的條件下，市場價格猛漲了——較戰前水準上漲了九倍至十四倍。在這裏表現出無組織的市場的盲目性；這個市場的價值法則爲供求法則所控制。結果大量貨幣落到市場商人的手中。投機份子利用商品不足和國家價格與市場價格間的差額而從居民身上取得了利潤。

× × ×

一切參戰國家的貨幣流通量都增加了。但是蘇聯貨幣大量增加的原因、程度和條件，及其結果，却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不同。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紙幣的大量增加是通貨膨脹的表現。發行紙幣與徵收間接稅相似，是獨佔資本和剝削階級把戰爭重荷與戰爭後果轉嫁給勞動羣衆的慣用方法，這種方法掩蓋了軍費支出的實際來源，它不像實施新的直接稅和提高現行稅率那麼易於使人察覺。通貨膨脹是帝國主義和世界經濟危機的永久伴侶。獨佔資本以通貨膨脹使物價增漲的方法，從勞動羣衆的身上取得了驚人的利潤。職工的實際工資低落了。通貨膨脹摧毀了中小資本的企業家；它是資本積累和集中的最有效的方法。因此就極端地限制了資產階級國家對貨幣流通過程的作用。

馬克思寫道：『國家可以把任意數量的具有隨便一種貨幣名稱的紙幣投入流通過程，在這一個機械動作的同時，國家的控制力也就立即結束。進入流通中的價值符號或紙幣則處於流通的內在法則支配之下。』（註二）過剩的貨幣的發行，引起了生產機關和流通機構的混亂與經濟破產的愈加增長、加深和尖銳化。資產階級國家一旦走上通貨膨脹的道路向來是無法使它停止的，只有依靠實施特殊措施的手段——主要是靠外債的援助，纔能克服幣制的混亂。

偉大衛國戰爭期中，蘇聯經濟所特有的貨幣流通過程，

和資本主義的通貨膨脹沒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首先是在蘇聯沒有發生過生產機構和國家、合作社商品流轉的任何混亂現象，從社會主義經濟的特殊性上說來，這種現象，無論在戰爭期間或在戰爭結束以後，根本都不可能發生。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和蘇聯經濟的計劃性，根除了經濟危機和任何種類不景氣的可能性。在衛國戰爭期中的一九四三年，不僅在軍事行動的進程上，同時在蘇聯後方工作上，都達到了轉折點。這時經濟的戰時改造已經完成，在國內東部地區擴展了軍需生產和一部份的民生生產，並開始從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手中收復蘇聯的領土。從一九四三年的下半年起，國營和合作社營業的零售商品交易額已有系統地增長了，所有這些都立刻反映到貨幣流通情況上。

雖然由於戰時的條件和需要，引起了貨幣的大量發行，但蘇聯的貨幣流通仍是相對穩定的。在整個衛國戰爭期中，蘇聯貨幣在作為計算和檢查的工具、流通和支付的手段，社會主義經濟蓄積和人民儲蓄的形態上，都一直發揮着極重要的作用，而在衛國戰爭的第二個決定階段中，貨幣的作用和它的購買力都有系統地增加了。這表現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殊性和優越性，斯大林的天才領導的業績，以及在為完成斯大林五年計劃而鬪爭的戰前時期和衛國戰爭時期蘇聯人民英勇勞動的成果。

國家商品價格的穩定是蘇聯貨幣流通穩固的一個證明。在整個戰爭期中，國家零售商品的配給價格都保持了戰前的

低廉水準。工業品的國家批發價格和農產品的國家採購價格，也保持了穩定。

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是蘇聯物質的穩定和貨幣流通的相對穩定的基礎。在蘇維埃國家手中，差不多集中了所有的工業品和大部份的農產品，在最迅速殲滅敵人 and 進一步滿足戰時一切需要的目的下，有計劃地分配了國家的物資儲備和勞動後備。在很短促的期間裏，在極其嚴重的戰爭第一階段的條件下，創建了迅速成長的戰時經濟，這不僅保證了前綫的一切必不可缺的需要，而且能提供龐大的資源，來恢復由敵人手中解放的地區和擴大個人消費品的生產。

從衛國戰爭的頭一天起，黨和蘇維埃政府經由許多決定性的措施，以發掘和利用戰前我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所保有的儲備和能力，加強經費開支的節約制度，以及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和減低生產成本的基礎上增加生產量和蓄積。軍需品價格的減低就是在戰爭過程中獲得了成果的一個表現。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由於軍事需要的增加，在戰時各種軍需品價格的急劇增長，就說明了企業家的投機致富。蘇維埃經濟肅清了在社會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中的盲目供求法則的作用。廢除了生產手段的私有，粉碎了剝削階級，和消滅了資本主義的蓄積，特別是『藉戰爭而來的』資本主義蓄積。同時蘇維埃經濟制度使每個勞動人民關心於勞動生產率的有系統的提高和國家資源的最有效的利用，這是蘇聯擴大再生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戰爭掀起了蘇聯人民的愛國熱潮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競賽以及合理化和發明的新高潮。由於改善了生產組織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大大地減低了生產成本，特別是軍需品的成本。在戰爭期中，由於單位生產品的勞動和原料的節約，空前地實現了軍需品價格的減低。某些軍需品的價格減少了33.3%——50%。這種價格的減低，相對地減少了軍費開支（約減少了五百億盧布），提高了預算的有效利用。

從一九四三年起，集體農莊的市場價格開始下降，這標誌着衛國戰爭進程中貨幣流通的穩固。在一九四五年，這種價格較一九四三年降低了56.5%。市場價格的降低是由於個人消費品產量的增加、配給制度的改善、收復區的經濟恢復和輸入市場的農產品增加的結果。一九四四年所開設的、按上漲價格（營利價格）營業的國營商業，在減低集體農莊的市場價格上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曾數次減低營利價格。

由此可見，在整個戰爭期間，流轉範圍中的絕大部分，（批發貿易、國家採購農產品、國家定量供給制）盧布的購買力是相當穩定的，而在流轉範圍中的另一部分，（營利商業和集體農莊市場）在戰爭的第一階段，盧布的購買力雖形減低，但從一九四三年起却有系統的提高了。毫無疑義，商品與貨幣流通的這種情況，是和通貨膨脹完全不同的。

國家預算的收支關係也同樣標誌着蘇聯貨幣流通的穩定。僅在戰爭初期，蘇聯國家預算的支出超過了經常收入，

而這個超過也不過是一小部分：一九四二年超過了10.8%，一九四三年超過了3.5%。由於這種超過所發行的貨幣數量也不多，並在迅速減少。一九四三年蘇聯國家預算的收入超過了戰前水準，並從這一年起，預算的收入較預算的支出激劇地增加了起來。因之從一九四四年起，蘇聯國家預算的經常收入就超過了預算的支出，從而就沒有發行貨幣的必要了。自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七年，預算的經常收入超過預算支出的總數字、彌補了在戰爭初期預算支出超過預算經常收入的數字。這是蘇維埃財政優越性的鮮明表現。在財政史上我們找不出這樣的先例：在戰爭規模和破壞程度超過所有其他戰爭的戰爭進行中，不僅保持了預算的完全平衡，更能使經常收入實際上超過支出。就連在戰爭中致富的、最富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其國家預算在所有戰爭年代中也都

有赤字。

在衛國戰爭進行中，蘇聯國家預算收支差額的克服，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和財政鞏固的明證。革命前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和所有參加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戰時財政困難都演變為財政危機，相反地，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財政力量，却在戰爭進行中強大起來。

與蘇聯國家預算收入增加的同時，預算收支的構成也發生了變更，這標誌着經濟的發展和鞏固。由於生產額與商品流轉的增大以及社會主義企業利潤的增加，在預算收入中便

增大了社會主義企業和經濟機構的企業利潤和交易稅的比重。一九四四年這種收入達到了戰前水準，一九四五年較戰前水準超過了20%。在蘇聯國家預算的支出中，軍費的比重減低了，但撥給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措施方面的支出却增加了很多。在一九四三年的預算中，社會文化措施方面的支出超過了戰前水準，一九四四年，國民經濟方面的支出也超過了戰前水準。這都證明了在蘇維埃經濟中，沒有、也不可能存在資本主義通貨膨脹所特有的過程。

資本主義戰時經濟的特徵是剝削階級藉通貨膨脹而致富，勞動羣衆因通貨膨脹而貧困。在蘇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固有的特質，根本不能有這種現象存在。在戰爭期中，黨和蘇聯政府盡全力設法消滅敵人，並在戰時經濟所允許的條件下，竭力保持勞動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在整個戰爭期中，保持了糧食價格的戰前水準，社會主義企業和機關增加了工人的工資。至於在蘇維埃社會中，利用戰時困難而私肥了的投機份子的蓄積，在蘇聯社會財富中僅是無足輕重的一小部分。集體農莊市場商業在滿足居民的需要上，其實際的意義並不大。國家憑配給票配售給居民的商品和生產品，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投機份子的蓄積只具有消費的性質，因為在蘇聯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佔統治地位，只能容許不剝削他人的個人私有存在。

資本主義固有的盲目法則在蘇維埃經濟中不發生作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中的貨幣流通狀況，反映了社會生產品的

分配、生產構成的有計劃的變更。

× × ×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品的分配是通過貨幣的分配和利用（支出）而實現的：為獲得生產或個人消費所需的社會生產品，必須擁有貨幣，必須有貨幣收入。實物關係——社會生產品從生產範圍中直接轉移到消費範圍中去，不用貨幣，不用貨幣交換——向例只在製造生產品的企業本身消費該項生產品的時候纔能發生（工廠內部的消費，集體農莊內部的利用實物）。關於這一點必須指出：國營企業生產品總額，包括企業內部所消費的生產品數額，是用貨幣表現的，表現在企業的貨幣收支對照表和企業經營的財政結果上。

社會生產品的數量和作為支付社會生產品價款的貨幣收入之間的關係，是依據整個社會生產品的構成和它的分配而決定。全蘇人民利用他們貨幣收入的大部分作為購買基金而購買個人消費品，但他們並不都直接參加這些商品的生產。其次，在社會生產品的構成中有不少這樣的商品：它既能被用作個人消費品，又能被用作生產手段。結果，所有的個人消費品，不是完全通過零售貿易的溝渠，被人民的貨幣收入買去，而常有一部分個人消費品成為市場外的商品。在生產和個人消費之間，社會生產構成、社會生產品的分配，商品的市場部分和市場外部分的分配——所有這些，都和蘇維埃經濟發展各階段所特有的具體條件以及蘇維埃國家的具體的

經濟、政治任務相關聯。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管是社會生產品的生產與分配，或貨幣收入的構成與分配，都基於國民經濟計劃而實行。但是，在社會生產品的數量和根據個別需要的社會生產品的分配之間，以及貨幣收入量和它的分配之間，仍然可能形成不均衡的現象。這種可能是由社會生產品的流通和貨幣收入的運用的相對獨立性所產生的。在這裏，部分地表示出貨幣和其他任何種類的領貨單、發票有着基本的不同。在蘇維埃社會的再生產中，金融和信貸系統的重要作用也與此有關。

在平時，社會生產品的流通和貨幣收入的運用之間的不一致是局部性的，這個不一致是由於在質、量各方面沒有完成計劃的任務，工資的支出超過，直接違背了財政計劃原則與革命紀律，以及商品流通機構不完善所造成。但這個不一致在它的發生過程中，在它的胚胎中便被克服了。其次，在和平經濟的條件下，社會生產品的分配和貨幣收入數量及其分配之間的相互關係，具有很大的彈力特性。如果商品與供給很充足，居民的『剩餘』貨幣便不去購買商品，因而便不會增加消費的需要。而把它儲蓄起來。

此外，便是在戰時經濟條件下的情況。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經濟的戰時改造時期——工資基金未能和生產規模相適應。爲了保證勞動人民個人消費的一定水準，在改建企業基地和生產新的生產品時期，社會主義企業必須支給工人平均工資。因此，在經濟的大部分範圍

中，工資基金和生產規模的直接依屬關係，不得不暫時地被削弱。此外，企業、機關、團體都向動員參加蘇聯軍隊的職工支付了退職金。

在整個戰時經濟時期，社會生產品構成中，特別是軍需品的比重較平時增加了若干倍，而個人消費品的比重却顯著地降低了。社會生產品構成的這種變化，即使在工資水準不變（保持戰前水準）的條件下，當然也要招致工資基金和個人消費品儲備間的新比例，更不用說在戰爭時期，由於工業主導部門工資標準的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工人的平均工資是增加了的。此外，如前所指出：大部分消費品被撥到戰勤人員的給養、被服方面去，結果供給職工個人及其家族消費的社會生產品部分就形減少，而工資基金却增加了。在戰爭的第二階段中，隨着個人消費品生產的增加，這個不一致便逐漸減少，但是它仍殘存在整個戰時經濟時期裏。必須考慮到在戰後初期——戰後經濟改造時期——許多工人尚不能充分發揮其生產率。『社會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後者在生產改建時期，解僱工人，把他們趕到失業的隊伍裏去，前者則幫助工人改習另外一種技藝，並在生產改造時期支給工人平均工資。』（註三）

我們從居民的貨幣收支對照表上，可以看出在戰爭年代中，社會生產品的數量、構成、分配和居民貨幣收入的數量、分配之間相互關係的變更，居民的貨幣收入超過支出（包括向財政系統的捐獻和繳納）。這一點直接地反映在貨幣流

通狀況上。

在蘇聯，現金的存在，主要的是供應公有化經濟和居民間相互關係的需要。因為公有化的經濟內部——國營、合作社營企業、機關、和集體農莊間——向例是不用現金結算的。因此，貨幣流通量的變化，主要是依存於得自社會主義經濟企業、機關的居民貨幣收入，和居民在國營、合作社營企業購買商品的支出，支付國營、合作社營企業和機關所經營的非商業的公共事業費，以及向財政系統的捐款和繳款等貨幣支出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儲蓄銀行裏的存款動態。假如居民的貨幣支出超過其貨幣收入，在其不用儲蓄銀行的存款來彌補的情形下，就意味着貨幣流通量的減少。相反地居民貨幣的收入超過其貨幣支出，在其不適當增加存款的情形下，就意味着貨幣流通量的增加。因此，支付工資和採購糧食的支出，是把發行的貨幣，付諸流通的主要溝渠，而商業組織的收入，則是從居民手中回籠現金的主要溝渠。

由於戰爭初期零售商品交易額的減少，而此後，零售商品交易額的增長也趕不上居民貨幣收入的增加，所以在戰爭條件下想用一般的方法——通過商品交換——回籠流過程中的過剩貨幣，是不可能的。

× × ×

在戰時經濟條件下，貨幣發行額必定超過經濟流轉的正常需要。流過程中的過剩貨幣妨礙了戰後經濟的改造，對經濟流轉發生了否定的影響。如果不能根除流過程中的過

剩貨幣，就不能廢除配給制度，也不能過渡到擴展的商業。

配給制度和伴隨着配給制度而來的同一商品的多種價格，或多或少地削弱了貨幣和職工工資的作用，以及集體農莊莊員按勞動日所得的貨幣收入的作用。多元的價格違反了價值法則，並妨礙了有意識、有計劃、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地利用價值法則。同一商品的多種價格（配給價格、營利價格、集體農莊市場價格），製造了投機的可能，使居民有把貨幣收入的一部分進行計劃以外的再分配的可能，因此戰爭結束後，黨和蘇維埃政府立刻在其日程中規定了任務——準備在最短期間內廢除配給制度，從而肅清多元價格。在戰爭年代中，在貨幣形式下所蓄積的購買力，阻礙了向統一價格的擴展的商業的過渡。

伴隨着商品交易額的迅速增漲，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的預算收入，大大地超過了支出。商品流轉的增長超過了居民貨幣收入的增長。這一點當然反映到貨幣流通上。不過只靠增加商品流轉來克服流轉過程中的過剩貨幣，是不能過渡到不用配給票的統一價格的擴展商業的，何況這種辦法也不能採用，因為這樣一來，就可能使在戰時蓄積了大量貨幣的投機份子，藉減價囤購商品而有害於對勞動羣衆的供給。毫無疑義，投機份子始終是等待着進一步的減價的。其次，還需考慮的是：在曾經淪陷的地區，被敵人搜括運往國外的貨幣，伴隨着敵人偽造的貨幣侵入蘇聯，堵塞了商品流通的溝渠。

因此，爲了：（1）肅清流通過程中過剩的貨幣；（2）進一步保證有利於廢除配給制度的貨幣條件；（3）根除居民貨幣收入的一部分在計劃以外的再分配和投機的可能性；（4）肅清流通過程中的偽幣；（5）制止在戰時蓄積了大量貨幣致富的投機份子在廢除配給制度以後利用減價囤購商品；必須實施有關貨幣流通的特殊措施：發行新幣，兌換舊幣，重新核定儲蓄銀行和國家銀行中的存款，以及更換國家公債。

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充分的照顧了國民經濟和人民的利益，在最短期內解決了上述任務。幣制改革不但沒有引起經濟的，財政的困難，反而恢復了經濟週轉，愈加鞏固了蘇維埃財政。

幣制改革的高度效果和它的偉大勝利，首先是以和它同時實行的廢除配給制度和過渡到統一的減價的擴展的商業爲條件的。這是一九四七年蘇聯幣制改革所特有的，卓越的特點。假如沒有幣制改革，戰後配給制度的廢除不可能推行得這樣快，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在幣制改革的同時，過渡到不用配給票的統一價格的擴展商業，則幣制改革就會是沒有效率的、不成熟的。當過渡到擴展的商業時的減價，和能用新幣隨便購買商品，就意味着恢復了足價的盧布，和大大的提高了盧布的購買力。不用配給票的統一價格的擴展的商業，根除了蓄積新幣投機的可能，保證了貨幣的正常機能。

由於幣制改革的勝利，擴大了食糧和工業品的生產，從

而引起了商品蓄積和零售交易的擴展。這個勝利和加強國家經費支出計劃的運動，加強工資使用的監督，以及改善在戰後經濟改造過程中的經濟領導和經濟計劃方法，具有不可分的關聯。

幣制改革的高度效果，基本上是靠釐定正確的兌換率和及時設法肅清貨幣流通的混亂狀態來決定。極充分地考慮新幣的經濟內容、意義和它的實價而規定的兌換率和兌換規則，保證了肅清流通過程中過剩的貨幣，特別是投機份子的過剩貨幣，刺激了國家信貸和儲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

現金兌換的高比價（1：10），影響到所有擁有舊幣的人，但這次幣制改革，却卓越地打擊了投機份子。由於採取了向勞動羣衆提前支付十二月份工資和其他勞動收入的辦法，當新幣發行的時候，勞動羣衆差不多已用盡其所領得的舊幣。所以廣大羣衆的損失是不大的，而這點損失，由於廢除配給票過渡到統一的減價的擴展的商業，和以極優待的比率重新核定存款，差不多完全得到了抵補。在一年間，由於減價，使居民節省了五百七十億盧布以上。職工實際工資和集體農莊莊員貨幣收入的價值，都被提高了。統一價格的擴展的商業，使每個公民得以按照自己的嗜好和需要而選購商品。由於工業品營利價格的大減，使照數折爲新幣的小額存款的實際價值提高了二倍，其餘的存款也提高了半倍到一倍。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國家爲實施幣制改革付出了絕大的犧牲。況且居民的損失是暫時的，因爲個人消費品的生產和商品週

轉的擴展，將使物價再行減低，使盧布的購買力更加提高。

一九四七年幣制改革促進了向統一的減低價格的擴展的商業的過渡，但沒有改變貨幣制度的本質。它發行了新幣，廢除了切爾達萊茨（註四）的計算單位，並部分地改變了新幣的票面種類，但發行的基礎和規則以及貨幣的保證都沒有改變。這就是說，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和新經濟政策初期實施的幣制改革，根本不同。

在新經濟政策的初期，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外國武裝干涉，貨幣激劇貶值，整個貨幣流通機構紊亂，以及由此引起了經濟混亂，當時的首要任務，是穩定盧布和建立一種完善的新貨幣制度，以及根本改變貨幣發行的條件、規則和貨幣的保證。在進行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遭遇了很大的困難，因為工業已被世界大戰和武裝干涉所破壞，農村經濟中小商品生產佔據優勢，私人商業在零售商品流轉中起很大作用，國營與合作社營企業和經濟機關僅開始在經濟核算制的基礎上具有新的形式和工作方法，國家預算上是鉅額的赤字。爲了建立穩定的蘇聯貨幣，經過了三年的緊張工作。

一九四七年實施幣制改革的基本任務，在於肅清流通過程中的過剩貨幣。戰時經濟時期，在有組織的商品流轉範圍中，貨幣保持了應有的穩定，國營合作社營商業的價格實行了有計劃地改變，正確的計算基礎並未遭受破壞。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下，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幣制改革所建立的蘇聯貨幣制度，經住了戰爭的考驗。由於社會主義的勝利，

在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無限地發展了國家的生產力，增加了蘇聯的國內資源，鞏固了計劃性的領導，和提高了整個蘇聯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組織性。所有這些都保證了實施這次幣制改革的迅速和高度效果。

× × ×

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和一九二二——一九二四的幣制改革一樣，都是為勞動羣衆的利益而實施的。這一點和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幣制改革根本不同。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爲了制止紙幣的膨脹也實行幣制改革，但這種幣制改革的本身就是剝奪羣衆的通貨膨脹政策的延續，只不過是用另一種形式和另一種方法罷了。資產階級各種幣制改革，是逃脫由戰爭或其他原因所產生的貨幣、信用、金融危機的手段，是有利於剝削階級而損害勞動羣衆的。它使失業增加，實際工資減低，農村更進一步地破產，但却使大資本家們更加致富。因爲他們不備預先知道將要實施的幣制改革的內容，並且能左右幣制改革的條件。以各種方法實行的資本主義幣制改革都只是把幣制紊亂的後果轉嫁給被剝削階級，並替資本主義的榨取建立最適宜條件。

任何資本主義幣制改革的方法都不能在蘇維埃經濟條件下適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企圖把蘇聯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和一九四七年實施的幣制改革曲解爲貨幣貶值，這只能證明出這些經濟學家不能認識現象的本質，或是暴露出他們欺騙羣衆的、奸狡的誹謗。蘇聯的兩次幣制改革都減低了

物價，提高了職工的實際工資和農民的收入。——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使購買力低下的貨幣和足價的貨幣相兌換，在物價激減時，保持了工資標準的不變，提高了存款的實際價值，打擊了投機份子，並根除了助長投機份子活動的條件。蘇聯幣制改革的性質和結果，都和資本主義的貨幣貶值完全不同。

蘇聯的幣制改革，是另一種原則上的改革。其固有的特質，是由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經濟任務所產生，並以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殊性和優越性為依據。

甚至在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的複雜的經濟結構的條件下，以直接的有計劃的領導社會主義企業與國家機動地利用集中在它手中的大宗商品適當地調節價格的措施，對於穩定盧布和鞏固幣制改革所獲得的成就，都具有重大意義；蘇維埃國家正是利用了自己的這種經濟上的指揮地位，制止了市場的盲目性而實現了改革計劃。現在，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已整個地統治着蘇聯，當蘇維埃國家的經濟作用已較過渡經濟時期無限地增長起來的時候，這種蘇維埃幣制改革方法的卓越，就更加鮮明了。

——一九四七年的幣制改革，不是國家對貨幣流通過程中的盲目自流現象的間接干涉，而是有計劃地肅清貨幣流通中的戰爭後果。蘇聯幣制改革的業績和它的持久勝利也由此決定。

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資產階級的貨幣制度，標誌着極性的不穩固。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國家爲了克服貨幣流通中的戰爭後果和實施幣制改革，幾乎化費

了十年的歲月，但仍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恢復金幣的流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金幣流通，是能保證幣制的相對穩定的——而在其幣制剛要穩定的時候，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就摧毀了它，造成了完全放棄『金本位』的結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制改革，是徹頭徹尾的依靠幾個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纔建立起來的，這就是依靠外債來安定本國通貨和用外幣來決定本國幣值。世界經濟危機更加强了這種依賴性，使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幣制，都直接隸屬於世界帝國主義掠奪者。『貨幣限界』和『通貨集團』就是在貨幣流通中劃分勢力範圍的直接形式。所有資本主義國家貨幣的穩定，已經直接地、特別地依賴於控制着國家機關的世界壟斷資本主義者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度摧毀了世界經濟危機後所達到的暫時與相對的貨幣穩定。在我國以外的戰後幣制改革中，只有新民主國家獲得了積極的成果；這是由於這些國家的基本的經濟指揮地位掌握在人民政權的手中，實行了民主的政治經濟改革，根除了國內獨佔資本的支配和對外國經濟的依賴性。在這一點上，偉大蘇聯的友好援助，曾起了並將繼續起着巨大的作用，資本主義國家（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在戰後實行的幣制改革是失敗了：貨幣流通量再次增加，獨佔資本繼續利用通貨膨脹掠奪羣衆。

資本主義在其經濟總危機時期，沒有力量穩定它的貨

幣。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兩年多了，資本主義國家貨幣體系的混亂情形，不僅未被克服反而不斷地加深，通貨愈加大規模的膨脹，從而助長了新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成熟。在這個時候，獨佔資本盡量利用通貨膨脹來向工人階級進攻。僅在一九四七年，美國的物價就增漲了50%左右，一九四七年末失業者超過三百萬人，同時，更有八百萬以上的工人得不到整週的工作。與此同時，獨佔利潤卻達到了驚人的數字，並在繼續增加。根據官方統計，在一九四七年除納稅外，獨佔利潤達一百七十億美元；杜魯門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致國會咨文中也說，這個數字在利潤上『是一個新紀錄』；一九四六年只有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一九四七年來，法國零售物價的指數較戰前水準增漲了十三倍。英國遭受着日益尖銳化的金融危機，工黨政府把一切重荷都轉嫁到勞動羣衆的肩上，國內通貨愈益膨脹，物價繼續上昇。美國獨佔資本，特別是利用着貨幣危機和臭名遠馳的「馬歇爾計劃」，不斷地加強其對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先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完成了幣制改革；完全沒有依賴資本主義國家集團而建立了穩定的幣制。這個幣制經住了所有的和各式各樣的考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縱使蘇聯在戰爭中蒙受了任何其他國家不能與之比擬的鉅大損失，但仍先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肅清了貨幣流通中的戰爭後果，廢除了配給制度，恢復了足價貨幣的流通。

蘇維埃貨幣具有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可能有的堅固的保障。這個保障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首先就是大宗商品集中於蘇維埃國家手中，能够使之按固定價格週轉。蘇聯的幣制改革是建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生產手段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基礎上。對外貿易的獨佔也保持了它的穩定性和獨立性。蘇聯的貨幣流通是建築在國民經濟計劃的基礎上，它有利於國民經濟計劃的完成和超過。

幣制改革加強了蘇聯貨幣作為經濟核算制的槓桿和社會主義計劃工具的作用。它提高了職工工資和集體農莊莊員按工作日計算的貨幣收入在刺激勞動生產率增長方面的意義。它是提高勞動羣衆物質福利水準的有效手段。它幫助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並進一步地增加了蘇維埃國家的雄厚實力。

註一：H·沃茲涅辛斯基，蘇聯戰時經濟，一九四七年，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版，第一三〇頁。

註二：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黨出版社，一九三三年，第一三四頁。

註三：H·沃茲涅辛斯基，蘇聯戰時經濟，一八〇頁。

註四：切爾達業茨是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幣改時發行的貨幣，其價值等於十盧布。

（譯自『經濟問題』、一九四八年第一期）

蘇聯儲蓄銀行的任務和使命

一 社會主義社會人民的儲蓄

由於在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裏，實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政策的結果，蘇聯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是不可比擬地增長了。一九四〇年，蘇聯國民收入超過了一九一三年的六倍。

蘇聯光榮的經受了反抗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的嚴重的戰爭考驗，並且在戰爭勝利結束後，從新開始了和平建設。

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所獲得的成就，奠定了提高蘇聯國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準的基礎。勞動者儲金額的增加，就是這個提高的明證。

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原則，是產生蘇聯國民閒散資金的基本經濟前提。這個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具有着重大意義。它能使工人，把自己勞動的物質興趣和社會利益結合起來。

按勞付酬的制度，使勞動者能夠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積蓄起來，以便日後遇有必要的時候，再把這些積蓄用在滿足自己更大的需要上，工資優厚的工作中，較大積蓄的形

成，也是如此。城市與鄉村中勞動生產力的增長，是促成此等積蓄所有者的數目增加的原因。

人民儲蓄款項，是準備把它用在各種消費性的需要上。勞動者的積蓄貨幣，是爲了能夠得到他所需要的、做爲巨額開支之用的款項。（例如：爲購買珍貴品，消夏之用等）因爲這樣的巨額款項，是不可能從他平時的一次收入裏得到的。

但是預先未確定使用目的的儲蓄，也很普遍，例如作爲預料以外的各種開支的預備金。然而，絕不可把這樣的預備金，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的『防患之需的儲蓄』，混爲一談。蘇聯社會裏沒有失業，這裏有的是免費醫療，兒童義務教育，和職工社會保險制度，這一切加在一起，便根除了必須做這種儲蓄的主要原因。

個人生活中的節約與對社會財產的節約二者之間，存在着密切的聯繫。伊·加里寧在他『關於共產主義教養』的報告裏，曾經指這一點爲共產主義的特徵。列寧在他的『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以及斯大林在第一次五年計劃總結裏，都會強調指出，必須把所有極微薄的積蓄，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上。

勞動者把他們的積蓄交給蘇維埃國家支配的社會意義，是在於它的使用目的和國家的其他經濟活動中的節約一樣，爲了發展國民經濟，發展文化與增強蘇聯的武裝力量。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年代裏，人民交給蘇維埃國家使用的積蓄，是軍費支出的主要源泉。勞動者對於建立蘇聯國防

基金與紅軍基金，對於戰時公債和貨幣實物彩票的順利推銷，特別表現了他們的愛國熱忱。

二 儲蓄銀行吸收儲蓄的作用

國家勞動儲蓄銀行的最重要的任務，在於使人民可以很方便地、有利地和安全地保存自己的積蓄和閒散資金，並協助人民增進積蓄，組織吸收積蓄的工作。

儲蓄銀行吸收存款的工作，可吸取因種種原因沒有化費而一時留在人民手中的款項，以充社會主義建設之用。這樣，便可能使千百萬人手中的短期空閑的小額現款，匯集成巨額的基金，而且這種基金一般還是比較固定的。

每個存款人，把存款交付儲蓄銀行後，他保有在任何時期取回該款的權利。在儲蓄銀行裏，每天有些人是去存款，而另外則有些人是領取存款。然而實際上，儲蓄銀行裏經常保存着巨額的有系統地增長着的款額。這些資金，可以應用在完成蘇維埃國家面前的財政任務上。

人民存放在儲蓄銀行的款項，可以作為儲蓄銀行本身或國家銀行（因為儲蓄銀行將庫存現金交存該行）付款之用。這樣可以減少發行紙幣的必要，減少有關紙幣的印刷和運輸等費用。

把錢存在儲蓄銀行，既方便又有利；因為儲蓄銀行的存款戶，享有很多法律上的實際權利和優待。

儲蓄銀行對於組織儲蓄，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儲蓄銀行

給人民提供了方便有利的存儲自己積蓄的機會，僅僅這一點，已經極有利於這些積蓄的增長。

儲蓄銀行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應該着重在養成勞動者日常生活中的節約習慣。勞動者把錢存在銀行裏的保存期限，一定比放在家裏的保存期限長得多，並且更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儲蓄銀行就是這樣地幫助存款戶儲存自己的積蓄，延長保存積蓄的期限。

如果想成為人民儲蓄的積極組織者，儲蓄銀行應當經常向羣衆進行關於吸收存款的解說工作。

『蘇維埃國家勞動儲蓄銀行條例』，是一九二九年頒佈的法令；該法令確認儲蓄銀行為國家信用機關之一。儲蓄銀行的基本任務在於吸收人民的資金。在這一點上，儲蓄銀行與其他信用機關——即與辦理各社會主義經濟單位的存款，放款與轉賬的銀行，是有很大區別的。

三 儲蓄銀行與公債

公債與儲蓄銀行存款（連同國家保險），是吸收人民積蓄的基本形式。分銷公債以及為公債持券人服務，是儲蓄銀行的主要任務之一。購買蘇聯公債券的資金和存入儲蓄銀行作為存款的資金，其經濟性質是同一的。這些資金都是以勞動者收入為源泉的儲蓄。交付存款和認購公債都是自願的。

勞動者可以隨時提用他存放在儲蓄銀行裏的存款。而認購公債，則是把資金長期儲存在國家手中；近年所發行的公

債的期限是二十年。這就是公債券的流通方式與存款收付手續之間的區別。（註一）

公債券和銀行存摺之間，還有法律上和技術上的根本差異。銀行存摺不同於公債券的地方，就是在大多數情形下，銀行存摺是記名式的，它是證明存摺持有人有權從儲蓄銀行領取存款的證件。存款人所持有的存摺與儲蓄銀行裏的證件——存款分戶賬，是完全相符的，同時存摺上的存款額可增可減。所有這些儲蓄銀行與存款人之間的法律關係，是不同於儲蓄銀行與公債券持有人之間的法律關係的。

四 存款的構成及其流動性

存款，按其構成形式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存款的逐漸積累為特徵：這時存款人的存款次數很頻繁，但每次的交款數目却比較小。支付業務的次數顯然少於收入業務的次數，而後者的金額也比較大些。存款人常常是為了一定的目的，採用這種存款方式，當存款總額達到預定的數目時，他便從儲蓄銀行將存款取出。

第二種存款則不是在存摺上逐漸積累起來，而是以次數稀少數額較大的交款所構成的。這種存款的付款業務的次數，顯然超過收款業務。存款的支出額也少於收入額。

這種存款，是由存款人把他在儲蓄銀行以外事先積蓄的款項，或者把他的一次進款（例如獎勵金，稿酬等）添入存摺而形成的。存款人日後按其所需，可以從儲蓄銀行零星地

支取他的存款（但有時也支取全數）。

儲蓄銀行的任務，不僅要吸收存款人逐漸積蓄起來的存款，而且要吸收一次的巨額存款。

我們現在來考察存入儲蓄銀行的存款的固定期限如何，它的穩定性如何？存入儲蓄銀行的資金，基本上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活期性的存款，這是勞動者預算裏的庫存金額。存款人把這筆款項存入儲蓄銀行的期限是很短的，這是為了充作領取工資以前的日常開支之用。在許多情形下，存款人把一部分工資存入儲蓄銀行，是爲了以轉賬方式支付各種當前費用（例如房租，公用事業的取費等）。

由於活期性的存款是由存款人按期交付的，短期的，所以它的週轉額很顯著。雖然如此，活期性存款在存款總餘額裏，並不起主要的作用，儲蓄銀行所吸收的存款的主要部分，是期限較長的存款。

第二種是季節性的存款。這種存款很普遍，因爲許多勞動者，爲了積存款項，充作各種季節性費用而利用儲蓄銀行（例如爲購備冬服、燃料等）。

在某些年代，季節性積蓄會爲儲蓄銀行存款的重要來源。雖然如此，這些積蓄也不是儲蓄銀行存款的主要部分。

儲蓄銀行存款的主要部分是長期存放在銀行的款項，它的期限往往達數年之久。有關存款週轉和儲蓄銀行虛布的平均存放期限的資料，就是這件事的明證。（註二）

一九四五年，蘇聯儲蓄銀行存款總餘額週轉了一·一次。由此可見存入的盧布不流動地存放了將近一年（三百三十二天）。

儲蓄銀行應當採取一切措施，以協助存款人，長期保存其積蓄。儲蓄銀行如能正確的佈置並進行他的工作，他所吸收的活期性存款的一部分，是具有儲蓄性質而不被化費掉的。所以儲蓄銀行的重大任務，是在與吸收長期存款的同時，還應當吸收人民的季節積蓄和暫時留在手中的款項。

五 儲蓄銀行存款人的成份

蘇聯儲蓄銀行所吸收的資金是名符其實的國民積蓄，因為它是取源於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的勞動收入的。成百萬的勞動者，利用儲蓄銀行去保管自己的積蓄和空閒資金。

一九四六年初，儲蓄銀行按照社會出身，將存款人分爲下列各類，存款人總數的26.3%是工人及其眷屬；43.5%是職員（連同其眷屬）及軍務人員；15.3%是集體農莊莊員；其餘則是個體農民、學生、手工業者、恤金生活者，自由職業者以及其他在儲蓄銀行存款人分戶賬上未記載其所屬的勞動者。

儲蓄銀行裏存放着大量的工人和職員的儲蓄。與此同時，我們却看到，銀行在吸收農民積蓄方面的工作是有缺點的。在蘇聯儲蓄銀行成立的初年，它的存款人僅是少數個體農民。農業的集體化以及集體農莊制度的鞏固，給我們的農

民開闢了走向富裕和文化生活的道路。因而持有積蓄的農民的數目，一天多於一天。

鄉村裏設有很多儲蓄銀行。然而其中的多數，還未在鄉村裏獲得應有的威信，從而便無法利用這種威信進行吸收農民存款的工作。所以進一步改善鄉村工作，是儲蓄銀行的極重要任務。

許多勞動者在儲蓄銀行裏存有巨額的存款。巨額存款戶逐年增長着。

儲蓄銀行與爭取增加巨額存款戶的同時，應當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一般地使存款戶增加；吸收那些擁有比較小額積蓄和空閒資金的勞動者做自己的存款戶。

六 儲蓄銀行對所吸收的資金的運用

儲蓄銀行每年收付存款的總額共達數十億盧布，其中，存款人存放的金額，照例總是有系統地超過支付的金額。爲了能不間斷地滿足存款人的要求，儲蓄銀行手中必須掌握少數現金。

儲蓄銀行每逢需要補充準備金或充實庫存現金的時候，可以抽取存在國家銀行的活期存款。

應當說明，這些資金是與儲蓄銀行庫存現金不同的，它們是參加了國家經濟活動的：它們與掌握在國家銀行手中的其他資金一樣，被充作對社會主義經濟企業의短期放款。

儲蓄銀行存放在國家銀行的資金數額並不很大。這個數

目雖然比儲蓄銀行的庫存現金多，但總不超過幾億盧布。

儲蓄銀行運用資金的基本方式，是把它所吸收的存款，集中地用在認購特別公債上面。

投在認購公債方面的空閒資金，是被利用在蘇聯國家預算的預定目的上。儲蓄銀行這樣利用吸收的存款，是完全適合勞動者的利益的，因為這有助於人民生活的富裕和文化水準的繼續提高。

銀行利用存款購買公債，從存款人的直接利益上看，也是很正當的。因為儲蓄銀行可以把從公債所獲得的收入，用作支付存款人的利息（此項收入，同時也是儲蓄銀行必要的行政費的源泉）。

七 儲蓄銀行的業務

『蘇維埃國家勞動儲蓄銀行條例』中規定：『儲蓄銀行的目的在於使人民能有息存儲其積蓄及空閒資金，協助現金結算和辦理其他業務』。這個業務範圍在目前是很廣泛的。

儲蓄銀行的第一種業務是有關公債分銷和為公債持券人服務。這些業務中，有辦理公債認購手續及收集認購金，向認購人交付債券，根據公債的發行條件進行公債買賣，支付中籤獎金及債券利息，償還滿期的公債，代理保管債券等。

儲蓄銀行的第二種業務是吸收存款和為存款人服務。這種業務，除收付各種存款以外，還辦理轉賬付款，以及存款和現金的轉存外地儲蓄銀行。此外儲蓄銀行還辦理收付匯款

的業務。雖然存款人以外的任何人也可以在儲蓄銀行領取匯票，但匯款的業務是與存款接近的，因為匯款也是吸收空閒資金的一種形式：即可以吸收旅行人士的資金。

第三種是代理業務，這就是辦理其他機關委託的事務。這是一些既與分銷公債工作無關，又與吸收存款工作無關的各種為顧客服務的業務。儲蓄銀行辦理款項的收付，將收入的款項匯交國家銀行；付出的款項則由該銀行支撥。

由儲蓄銀行辦理代理業務，是因為儲蓄銀行網密佈各地，這對於人民的交付或領取款項，極為便利。但如果過分的擴大儲蓄銀行的機能，則勢必不利地影響其為存款人及公債持券人服務的工作。所以儲蓄銀行在增添任何新業務時，必須經過蘇聯財政部的許可。

儲蓄銀行現在辦理的代理業務有如下幾種：對勳章獎章獲得者支付獎金，支付個人恤金及科學院年金，對子女多母親及單身母親支付國家津貼；收受捐稅（在城市裏及工人村），國家保險費，黨員費及青年團員費。儲蓄銀行並且代賣國稅印花，郵費支付證（郵票及郵政信封）等。

由此可見，儲蓄銀行是與成百萬勞動者有緊密聯繫的機關，儲蓄銀行應當很好的利用這一點，去加強吸收存款增加存款戶的基本工作。

八 蘇聯儲蓄銀行的任務與資本主義國家儲蓄銀行任務的差異

如上所述，儲蓄銀行在蘇聯的國民經濟中，具有重大意

義。它們協助勞動者在時間上適當地分配金錢支出，並且以所儲存的款項，使我國人民得以進一步滿足其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要求。

儲蓄銀行所吸收的資金，是使用在有利於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以及國防能力的增強方面。蘇聯儲蓄銀行的任務，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儲蓄銀行所起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

資本主義各國的儲蓄，實際上是帶着強制性的，因為勞動者由於沒有物質保障，不得已而儲蓄，例如：失業的威脅，疾病的醫療，養老準備等；勞動者是以犧牲自己所急需的費用來作儲蓄。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國家的儲蓄銀行，是促使已經很低的勞動者的生活水準，更加低下。

『儲蓄銀行的目的——至少它的正確的經濟意義，應當在於利用工人本身的遠見和明辨，使有利於勞動的時間與不利於勞動的時間均衡起來，從而使工人在工業生產的週期裏，分配自己的工資，以便使他們的支出永遠不致超過他們的最低工資，永遠不致超過他們最低的必需生活費。』（註三）

這裏應當說明，資本主義環境裏的工人儲蓄，僅僅佔儲蓄銀行存款總額的極小部分。儲蓄銀行所吸收的資金的主要部分，是由人數不多的中小資產階級的存款戶所構成的。

資本主義國家儲蓄銀行所吸收的存款，是用在企業家們的利益上，即用在從儲蓄銀行或存有儲蓄銀行資金的國家銀行裏借用資金的企業家們的利益上。這些國家儲蓄事業現狀

的更大的特徵，就是把儲蓄銀行所吸收的資金，廣泛地直接地利用到擴充軍備，進行帝國主義戰爭，以及彌補預算赤字等方面去。

註一：認購一九三八年國內有獎公債的資金的性質，與存放在儲蓄銀行中的資金沒有多大區別。

註二：用存款的平均每年餘額除全年交付存款戶的總額，就是存款週轉；平均每年餘額可用簡單方法算出：即以十二個餘額（一月一日與每月的末日）相加後的得數除以十二。爲了求得不流動地存在儲蓄銀行中的盧布的平均期限，須將全年日數（365）除以全年的存款週轉數。

註三：馬恩全集第五卷，第546頁。（俄文版）

譯自『蘇聯儲蓄銀行』本文爲其第一章

基本定價 270 元